

第六章 让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军歌声唱响寰宇

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军官，军官乃军队之骨干，应以精神为主，精神之消长即关于全军之强弱，以全身之精神振作军队，巩固国家，应以武勇信义，礼仪，军纪为主。至于服从上官，遵守命令，保持名誉尤为军人精神之基本。故本校锐意涵养学生之精神，戒柔懦慎学术以为他日完全之军官。

——转载自郑开文编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

第一节 “云南陆军讲武堂”遗址与“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



郑开文题书《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手迹）

四季如春的昆明有风景如画的翠湖，以时时变幻翠、兰、绿的斑斓色彩而著称。若把昆明比作温情脉脉的西施，那翠湖就是她风情万种的眼瞳，湖边一栋长长的建筑就是她典雅的美眉。这座建筑就是以“革命熔炉”“将帅摇篮”享誉海内外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现辟为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建筑群主要包括讲武堂主体四合院，西部的兵器库、大礼堂、内操场、北部的照壁、盥洗房、围墙等文物建筑，占地 36000 平方米。讲武堂主体四合院由东、南、西、北四幢长约 116—118 米，进深 9 米，高约 12 米的两层楼房围合而成方形院落，占地面积 3600 多平方米。正门的上方，有一尖尖的屋顶，似一柄出鞘宝剑，直刺苍穹。建筑外立面呈明黄色，在云贵高原阳光的照射下，亮丽炫目，熠熠生辉，别具一格。大门和窗户为酒红色，则是最具中国元素的色彩，增添了它的庄重。门楼箭矢形的尖顶及铁艺窗套，二楼法式“大花瓶”围栏等建筑细部，纹饰图样线条粗犷，富有立体感，清晰可见与中国古典建筑相迥异的刚劲和硬朗。正门后面是方形院落，中央是面积开阔的校内操场，可以点校军马，习武练兵，一批又一批的讲武堂师生正是从这里起步，走向战场的。从这里走出了素有红军之父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元帅。走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元帅。走出了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李范奭将军，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次帅、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等邻国军政领导人。还有，从这里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龙云、卢汉、张冲、王甲本、唐淮源、寸性奇等 300 余位抗日高级将领；更有数以千计的讲武堂师生献身报国，壮烈牺牲，留下了无数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铁血传奇。

如今，拂去岁月的尘埃，几经修复，耸立在翠湖西岸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成为蜚声中外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在四周环绕的现代建筑群中，更显古朴、庄严、肃穆，成为国人景仰的红色旅游基地和“云南精神”的一张历史名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相继荣获“国防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称号。每年数百万人次，怀着崇敬、缅怀之情到访云南讲武堂博物馆。新入伍的士兵、警察来这里缅怀先烈，中、小学学生来这里观摩学习，海内外游客到这里参观游览，都能得到重要的人生启迪，收获无穷的精神能量。我所知道、认识的海内外友人，几乎都有与云南陆军讲武堂合影的相片，成为云南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

我也不例外，相册里几乎每年都有新近拍摄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的照片，闲暇时翻出来看看，别有一番思绪萦绕心头。时常冥想，这坐落在西南边疆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为什么会影响到中国及周边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这传世之作是谁筹办、设计建造的？曾经发生过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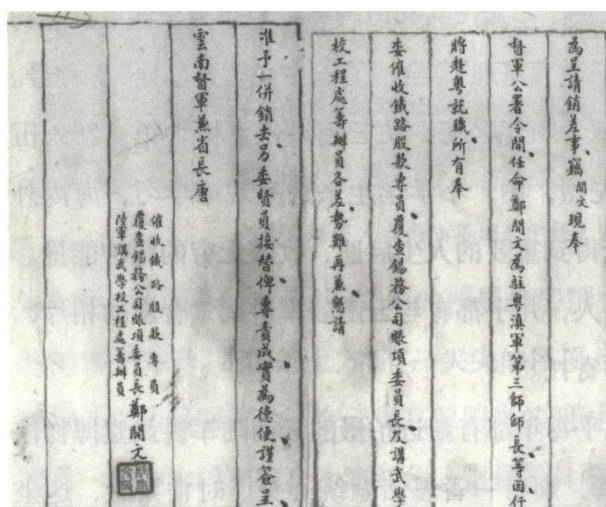
不知什么缘故，每当我凝视大门上方“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字体时，都会蓦然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偶然翻阅云南通海郑家营《郑氏宗谱》手稿，那一竖行“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毛笔字体，竟然闪电般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上的字体重合了，这是真的吗！

《郑氏宗谱》稿本是我外公郑开文在 1918 年 8 月 24 日编撰完成的，该谱序言曰：“……公余纂修，阖族珍藏。莫隳先绪通德，愈光勉之望之，警惕毋忘。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二十四日。（落款）陆军中将銜陆军少将、四等文虎章、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兼陆军讲武学校校长，调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十一代孙开文，纂修于滇垣威远街大柳树巷树兰堂本宅。”《郑氏宗谱》含有“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字样多处，其字体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字体酷似，几乎一模一样，难道这匾额与郑开文有关？

带着求证的渴望，千般的寻觅，终于在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郑开文致督军唐继尧的销差信、郑开文致广州军政府各总裁、政务会议、参议院、众议院的快邮代电，以及云南省图书馆藏书《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等毛笔手稿中，发现多份相同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陆军讲武学校”等字样，尽管这些文字写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牒中，依然有相同的书写习惯和落笔习惯。甚至连同一时期的《郑氏宗谱》稿本和《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手稿所用的毛边纸相同，捻纸线装订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印证“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字迹与《郑氏宗谱》稿本等多份毛笔手稿字迹完全相同，皆为郑开文手迹。

同时，在 1919 年 5 月 2 日呈唐继尧督军的“销差信”公文中，发现郑开文辞去“陆军讲武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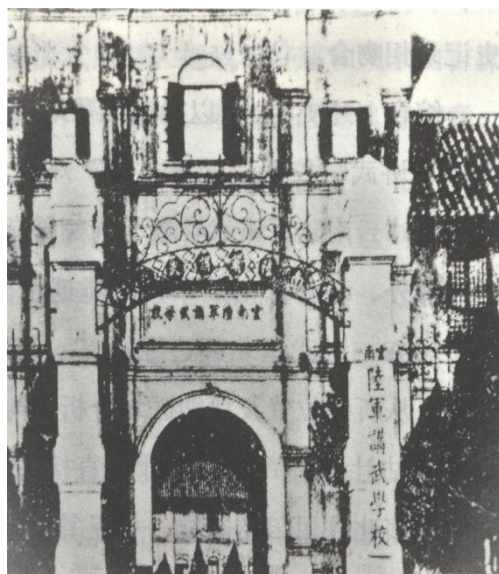
校工程处筹办员”一职：



郑开文辞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案由（手迹）（云南省档案馆藏档）

为呈请销差事：窃开文现奉督军公署令开，任命郑开文为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等因，行将赴粤就职，所有奉委催收铁路股款专员、覆查锡务公司帐项委员长及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各差，势难再兼，恳请准予一并销去。另委贤员接替，俾专责成，实为德便。谨呈云南督军兼省长唐^[1]

“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这个奇特的职务，迄今没有材料表明有其他人担任过，以云南督军公署顾问官、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和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身份担任“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足见这个职务的专一性、独特性。在前人叙述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文章中，我们悉知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遗址始建于护国战争胜利后的1916年8月，完成于1919年，这段时间正是郑开文校长任内，由他兼任“陆军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并完成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新校舍的建设，应该是个正常的工作程序。



云南陆军讲武堂东大门原样及郑开文题书“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立柱、门楣（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提供）

再有，笔者查阅到1916年12月6日《义声报》刊登香港富滇分银行代收华侨捐银款报告：……收郑君开文来港纸壹百元，开出第十四号收据。收孙君明来港纸伍拾元，开出第十五号收据。^[2]

郑君开文肯定是郑开文无疑，孙君明则是曾任两广护国军第七军参谋孙明，是郑开文的连襟，我的姨外公。此单据表明为筹集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新校舍的修建资金，郑开文曾亲抵香港，恃其在广东军界、政界多年积攒的人脉、口碑，以身作则发动华侨和香港各界人士积极捐资赠款。此记录与护国战争胜利后，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为建设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新校舍踊跃捐资赠款的历史记录相吻合。

综合上述史料，可以确定无疑地说，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遗址是由“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工程处筹办员”郑开文筹办、监督施工完成的，主楼大门上方“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匾额是郑开文手迹。

另外，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遗址多处建筑也依稀存有郑开文的特殊印迹。如，讲武堂北部边缘筑有一座照壁，从风格上讲，属典型的滇式建筑。从所处位置及功能区划分析，与传统意义上的照壁用途不太吻合，一般人估计与讲武堂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笔者熟知郑开文校长与当时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样是笃信风水的。1919年9月16日，身在广东韶关的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致电唐继尧，极其感慨地谈及他研究风水的过程：“开文竭尽心力，揣摩有年，跋涉山川，穷极艰苦，迭经高明指点，始觉稍有会心。”从风水勘舆的原理来说，昆明城的北方属水，盘龙江由北而来，穿越主城入滇池。每逢雨量充沛的年份，汹涌的江水往往有洪流泛滥的时候，建此照壁有断流蓄气的风水讲究。再则，北者，北方也，时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孙中山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南方发动的护国战争以及后来的护法运动都受到北洋军阀势力的压制和摧残，致使民主共和事业屡屡受阻。革命党人视北洋军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筑建照壁有防止北方势力侵蚀的含意，还有防范北方各种不良风气侵入的意愿。联系到讲武堂建筑群恰如一颗硕大的印谱画面，宽大的内操场，正是无字的印面，犹如寄语讲武堂师生们去夺印挂帅，为国家建立功勋。照壁上留白，未曾有字画题写其上，留待讲武堂师生凯旋时书写功榜勋名。抑或有提醒军校学生应该心怀慈悲，时刻记得以恭敬之心待人，时时铭记为国宣力之初心。看似简单的一栋滇式照壁，把政治好恶和风水凶吉揉为一“锅”，实在是匪夷所思。但出于风水流年，基业永旺的良好寓意，也算是郑开文的一番良苦用心吧。

无独有偶，现存云南省通海县郑家营村“郑开文故居”，已列为玉溪市一等革命文物、通海县历史文化名人保护文物，大门外也有一处照壁，留白，无字画绘于其上。在修缮郑开文故居时，曾就这个问题求教于老师傅们，匠人说，此为“无声胜有声”。

笃信风水者还有“云南王”龙云，当年跟随郑开文“跋涉山川，穷极艰苦”，想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历史上，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曾经有东大门和南大门两道大门。早期的东大门属于正门，高耸挺拔，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照片已有记录。东楼正中（也就是今天面临翠湖的大门）三楼有郑开文校长的办公室，其窗户向东开启，可与五华山上的省政府办公大楼相对视。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进行文物修缮时，此处仅存二层。据说这是龙云执掌云南政权时，因避讳三楼校长办公室向东开启的窗户可以窥视五华山上省政府办公大楼，遥遥雾霭里，似乎时隐时现令龙省长难以释怀的郑校长提携之恩以及对唐领导的变故之愧，遂下令将东楼第三层拆掉，处理成平层。后来，经过文物部门的现场踏勘，通过对基础的清理以及东楼、南楼的查验，终于查证了史实，为恢复重建东楼第三层提供了依据，还原了历史原状。

第二节 力图着着进行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郑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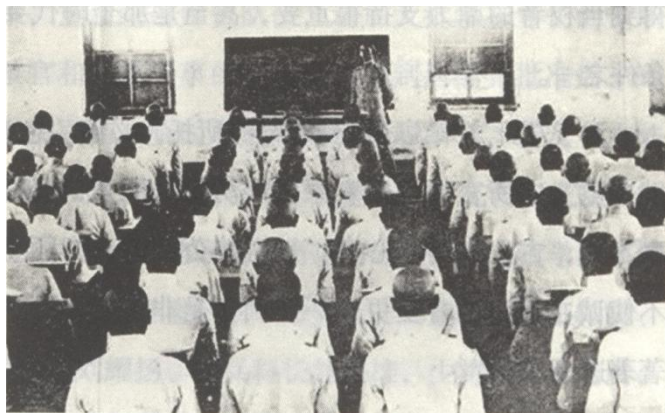
1916年6月，郑开文与唐继尧几经电文商议回昆明事宜，作为参与郑开文进入龙济光军事集团的谋划人，唐继尧颇能理解郑开文此时的境地，回滇辅助自己自然是求之不得。唐继尧即以中华民国军务院抚军长的权力调动护国军第七军长郑开文回滇，接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届时，在护国战争中功勋卓越的郑开文，完全可以向唐继尧谋求滇军中的任何一个职务、岗位，但他却仅仅要求去讲武学校教书而已。对于在民国政局里颠簸多年的郑开文来说，远离官场政局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得以休养生息，补偿下这十多年来对家庭、儿女的亏欠，无疑是件快慰的事情。但是唐都督可不愿意背个冷落老哥们的罪名，很快安排了职务：云南都督府顾问官兼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要不说唐继尧是很会笼络人心的，担任云南都督府顾问官可谓位高权隆，可实际参与滇省的军政事务，是对郑开文品德才干的推崇，对郑开文力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赞赏，这足以表达唐继尧对郑的诚挚心意。到讲武学校教书是郑开文的本意，虽然此教书与彼教书不同，这让郑开文既不能推却，也不能不领受唐继尧的这番得体的暖心，就此背上“士为知己者亡”的情感笼套。尔后的六年时间里，郑开文竭力辅助唐继尧，不但将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办成全国闻名的军事院校，为滇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后备军官，还分担唐继尧部分军政事务以及经济方面的事务，鞍前马后没有丝毫懈怠，遂成为唐继尧须臾不离的“姜子牙”，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义声报》关于郑开文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报道。（云南省图书馆史料）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的职务向来令人尊崇，十分重要。“滇军冠于全国”的美誉说到底就是源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培养了滇军大部分中高级军官，铸就了强大的战斗力。所以，蔡锷、唐继尧都很重视讲武学校校长的任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前任校长韩建铎、谢汝骥、刘祖武、张子贞、顾品珍、吴和宣等都是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护国战争”两役的高级将领。而任命郑开文为校长，不知底细者，似乎认为选择一个与本省关系不深的人士担任武校校长，甚觉唐突。普通老百姓、官佐知郑开文者不多，郑开文不但是本乡本土、地地道道的云南人，而且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是中华革命同志会、中国同盟会中军事组织的核心成员，毕业回国后不久即接任南宁陆军讲武堂总办（校长，由前任总办蔡锷举荐）。辛亥革命后，郑开文就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所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还曾担任广西南宁新军模范团督办（团长）、

广东陆军模范团副团长。其同盟会资深军事骨干的背景，创办中央、地方军事院校的经验，并有指挥多次重大战役的实践经验，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军事教育的先进理念，这是当好一所近代军事学校掌门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郑开文校长在陆军讲武学校授课时的情形（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提供）

客观地说，郑开文还有一个其他滇军高级将领中绝无仅有的条件，郑开文与唐继尧等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是歃血为盟的过命兄弟，共同走过从留学生到革命党人的每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在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实践中，经历、思维大体相同。故颇能理解唐继尧的掌军、执政的理念，而郑开文的军事教育经验与个人特质恰恰是实现这些理念、设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如何办好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思路、方法，多与唐继尧契合，得到当权者的鼎力支持很重要，甚至是那个时代要办好军官学校的先决条件之一。

对于郑开文来说，既受唐继尧所托，必然“忠人之事”，正如他致唐继尧电文中所言：“夫事原在 人马阳气所至，金石为开。精神贯注，何事不成，古人先得我心矣。忆自夔公归后，内顾无虑，愈知奋发，自勉不使诚心毅力稍有变更，一切利害是非在所不计。办事仍如在滇，力图著著进行。”^[3]

由于民国初期政权更迭频仍，特别是云南发动护国首义，扩军备战为当时首要任务，必以云南高级将领为任的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更是征调频繁，有旬月数易其人的记录在案。所以，从“重九起义”至护国战争结束的六年间，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只能以招收短训班、志愿者班为主，没有形成正规办学的模式。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规模建设、规章制度的完备、教学质量的提高，均难有突破之举。郑开文担任校长后，在督军唐继尧的全力支持下，“力图着着进行”，着力推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事教育思想的变革，对武校的学制、学科、教学内容和方式、师资结构、招生制度及校舍规模实行了一系列振兴、改革措施，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走上正规化办学的道路，出现了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才济济、兴旺发达”的景象，奠定了国内一流军事院校的基础。

一、讲武学校师资队伍的建设

1916年6月，郑开文正式接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此时生徒队长、兵科主任皆无，教官亦大都外调或兼职各部队，武校军事教学主要以招收短训班、志愿者班为主，时断时续。任职伊始，郑开文从讲武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着手，重新组建师资队伍，增加大批学有专长的专职军事教官，减少兼职教官和人浮于事的冗员。在得到唐继尧批准后，郑开文择优调用一批曾在民国南

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军官，以及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军事院校毕业生入校补充教职员缺额。与以往不同的是，郑开文从全国各地联络、引进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事教育、教学骨干，均是在国内享誉盛名的革命党人。如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步兵科长刘耀扬、骑兵科长林振雄，少将教官姜梅龄，还包括后来担任过民国陆军大学校长、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曾担任过讲武学校校长吴和宣、王兆翔等人，均是久经沙场，军事教育经验丰富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同期引进的日本陆军上校苦米地四郎主授高等兵学，日本陆军中校铃木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均具备较高军事学术水平和实际经验。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选择教学教育骨干时，注重选员的专业性结构和国际化视野，改变了以往讲武学校教官、训练、管理人员选才的地域限制和非专业化的缺陷。教官不再由日本陆士毕业生独揽，云南讲武堂、保定军官学校、湖北军官学校前期优秀毕业生也开始陆续在校内崭露头角，担任重要职务，并由学识、教学水平和品德的提升，逐渐升任教官、区队长。郑开文物色培养的这批人员中，尔后成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教育长或云南高等军事学校校长、教育长的有王兆翔、刘国栋、吴和宣、戢翼翘、戴作楫等人。

改革后的讲武学校教学骨干和管理人员的遴选均有制度性的任职要求。《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第五条规定：

校长以中将或少将充任。教育长以少将或上校充任。主任军官以上校充任。教官以上校或中校充任。副官长以少校或上尉充任。区队长以上尉充任。助教以少尉充任。军需以三等军需正或三等军需充任。军医以三等军医正或三等军医充任。编修（秘书、文牍人员）以三等编修正或三等编修充任。兽医以二等兽医充任。录事及勤务士兵之人数随时酌定。凡直接管教（学生）之教官、区队长、助教等，非品学兼优、精神振拔者，不得委充。

从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在册军校管理、教员名单》（1918年2月）中，可以看到届时担任讲武学校领导职务和军事主任教官、教官有36人获少校以上军衔，其中，少将及以上军衔有14人，均为国外留学归来者。他们站在军事教学第一线，对学员们倾囊相授、严格要求，使得讲武学校军事教学教育达到了较高水准。如此豪华的教学管理团队，致使学员对武校师资力量和学业前景充满了信心。华侨学生称赞道：“校长郑中将炳然暨管教诸公均系武学泰斗，教法美备，而滇中政府又相待优异，将来毕业当必小有成就，藉可为国宣力。”^[4]

如果说，郑开文这个人才选择方案以及办学经验，对黄埔军校影响极大，亦不过分。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之际，新式教官极为缺乏。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炮兵科长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骑兵科长林振雄及部分毕业生先后擢升为黄埔军校官佐，协助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还有，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生朱培德任黄埔军校第八、九、十期校务委员。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何应钦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战术总教官，后任学生团团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骑兵科长林振雄任黄埔军校第一期管理部主任。炮兵科长王柏龄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授部主任，第二期时即升任教育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毕业生叶剑英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授部副主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工兵科长帅崇兴任黄埔军校第四期中校学科主任军官。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李伯庚任黄埔军校第六期上校兵器教官。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生李典章任黄埔军校第

六期少校战术教官。

如果读者有兴趣将1917年2月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领导、管理人员的名册资料与1924年广东黄埔军校的领导、管理人员的名册资料对照比较，相信读者都能发觉其中的许多人就是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开始了他们军事教育的生涯，得到了锻炼、培养，在大革命时代亮出风采。王柏龄、刘耀扬、林振雄、杨杰、帅崇兴等人，其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历练和熏陶，使其成长为中国军事教育的翘楚者，终为黄埔军校所倚重，成就了自己的价值，也成就了民国时期最著名的黄埔军校。

这些经过时间与历史检验的事实表明，郑开文当初改革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师资队伍获得了成功，遴选的军事教育人才达到国内一流军事院校的水准，也为孙中山先生组建黄埔军校储备了坚实的师资力量，积累了军官培养的经验。偶然性中有必然，看似偶然的事情多了，就显现出其必然性的逻辑。郑开文识人、用人的见识和魄力，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良的成长条件，包括严格要求和公平的成长、发展机制，这是郑开文对民国初期军事教育的最大贡献。

二、创立云南讲武学校教育长及各兵科科长制度

郑开文校长根据军事教育的需要，在武校设立教育长及完善步、骑、炮、工各兵科科长架构，由戴作楫、林振雄、龚师曾、刘对扬分别担任步、骑、炮、工科主任教官，主持各科军事教育工作。至于教育长一职，暂时悬缺，虚位以待各科教官经考察后择优举荐。同年，步兵科主任教官戴作楫被正式任命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一任教育长，王兆翔、林振雄、龚师曾、刘对扬分任步、骑、炮、工四兵科科长。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无论人品才干，皆为当时中国军界的一时之选，是郑开文推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事教育改革、创办一流军事院校的坚强后盾。

三、推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生毕业、实习制度的改革

(1) 创立了讲武学校“入伍生队”。1916年10月，经唐继尧批准成立武校入伍生队，将校外委培入伍模式改为校内入伍、集中培训的模式，此为武校施行人伍生教育制度之始。

(2) 组建军官候补生队。1917年7月，唐继尧发动“靖国战争”，为争取华侨资助，于10月命令武校对外公开招考军官，组成候补生队，并特许华侨青年投考。这批军官候补生在经过考试筛选后，于1917年12月送入补充队第1队接受三个月的入伍生教育。此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自组建制军官候补生队，为毕业生实习提供真实场景和实际带兵经验，亦是黄埔军校“学生团”之雏形。

四、理顺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各时期的顺序问题

郑开文到职后，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各期、班的名义杂乱，因此在1917年3月，将前期毕业各班予以重新调整，确定云南陆军讲武堂以来的顺序问题。具体比叙对照如下：

(1) 云南陆军讲武堂甲班第一期、乙班第一期，比叙为武校第一期。（亦称云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以下各期均可称讲武堂第某期）

(2) 云南陆军讲武堂甲班第二期、乙班第二期，比叙为武校第二期。

(3)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比叙为武校第三期。

(4)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甲班、乙班，比叙为武校第四期。

(5)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丙班，比叙为武校第五期。

(6)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一届将校班，比叙为武校第六期。

(7)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二届将校班，比叙为武校第七期。

(8)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测量班，比叙为武校第八期。

(9)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警察班，比叙为武校第九期。

(10) 云南陆军武学校志愿班第1队、第3队，比叙为武校第十期。

(11) 1916年9月，郑开文将仍然在校学习的志愿第2队，取消原编队号，所有在学学生编为四个步兵区队、两个骑兵区队、两个炮兵区队、两个工兵区队，计216人。此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一期。^[5]

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的办学顺延递增有序，一直延伸至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停办。

五、合理的课程设置

自1916年招收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新生开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开设的军事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学科主要包括战术、筑城、兵器、地形、交通、斥候（侦察）、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工作教范、军制、经理、卫生、马学、战时国际公法等14项（典、范、令分科后各按科目教授）。术科主要包括制式各（单兵）教练至团（级）教练止、野外各种演习至支队演习止、徒手持枪、器械，各种体操、枪、剑术、马术、实弹（演习）射击。除军事学科、术科外，军校学生还有其他应授科目，普通学：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三角、几何、代数均择要教授）。外国语文：法文、英文、日文。还有不定时的政治、时事、伦理方面的演讲。普通学课程既强调中华传统文化的国学、历史、地理等，又要求学生掌握算术、代数、几何、化学等基础学科。同时武校学生还要选学至少一门外语，有英语、法语和日语可供选择。军事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即军事学理论课程和军事学应用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步兵科、骑兵科、炮兵科、工兵科、辎重兵科教授，每科都有自己的教学科目，可谓术业有专攻。在军事学课程中教授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以及军事能力，沙盘模拟、野外战术实施等课程都意在培养真正能指挥战斗的军官。

讲武学校完备的课程设置虽然有原陆军讲武堂课程设置的影子，但经过郑开文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均有较大的改革和提升，具有与时俱进、适合云南整军经武需要的特点，完全达到了国内全日制陆军军官学校的设置要求。

六、严格的学生考试、考核制度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试验（考试）问题由各教官拟定，呈监督阅过，再转呈校长选定。试验主要有五种：检定试验、临时试验、月末试验、学期试验、毕业试验。检定试验：学生初入校时施行。临时试验、月末试验：由各教官临时或月末自备施行。学期试验：每学期期末由校长命令施行。毕业试验：最后学期末由校长呈请，督军衡核后施行。

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考试的学员生应在考试期内进行补考。考试中严令禁止作弊行为，考场中学员要依指定之座次，不得自相更换及有夹带、枪替、窃视、耳语等弊，如有以上弊端，按照情节轻重惩办或减其品行分数。考场中要严格按照时间进行答题，超过限定时间交卷的学员无论实际答题好坏均不录取。

试验分为学科、术科、躬行三项，每项评定点数，每科目计数范围由零至二十点，八点以上

为及格。总平均点十七点以上者为最优等，十六点以上者为优等，十四点以上者为上等，八点以上者为中等；八点以下者不列等。学术科三门以上不及格的学生会被降班，总平均点数及躬行点不及格者则会遭到斥退。

考试分数固然重要，但武校十分重视学员平时的品德操行，综合考试分数=学术试验分数+品行分数。品行分数由教育长及本科教官参照学员平日的行为表现、勤惰及请假缺课情况决定并填写到簿册里。特别之处，品行分数不及八点者纵使学术成绩很好，所得点数应列上等的学生仍降为中等，而成绩中等的则降为不列等。武校还规定：“某科试卷经某科教官评阅后呈教育长，教育长阅后转呈校长核阅评定等第，至各教官阅卷时聚集一处与否由校长临时酌定。毕业试验若能合格由校长呈请督军发以毕业证书及成绩表，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的学生给予奖品以示鼓励，列优等者除给文凭外另给褒奖证书以示优异，不列等者不给文凭。不列等者发回本营，停升或改为代理甚则详请督军撤差降用”。

曾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学生，号称“铁骥将军”的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爽将军，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和坚忍不拔的内在气质就是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打下的坚实基础。他在回忆录中称赞道：“我们的学校十分重视对军人的人格、自尊心、名誉、信誉和军人形象的教育。”同时，该文向外界披露了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高素质人才的培养方法：

讲武学校评价学生的考核体系是一套科学的精细化管理系统。考核学生的时候，平时成绩占70%，考试成绩占30%，各科考试时，典、范、令各为1分，十大战术为1分，学科2分，技术科1分，训练1分，思想品德为2分，其中思想品德的分数最重要。学科的典、范、令和十大战术要分别记分后再总和，技术课有马术、器械体操、剑术等，占总分的三分之一。训练课包括野外训练。品德分主要是平时的表现，缺勤扣0.1分，学术课程缺勤扣0.1分，内务行政差错扣1分，违反校规扣1分，所以品德分是综合性的鉴定分。在进行成绩考核时，评定因素多，现存讲武学校入伍生考绩表中，打分项分别为性质、志趣、品行、体操、气概、勤务、学科、术科、特长、家计、交际，共十一项，除了个人基本信息外，还要填写赏罚情况和“上官所见”（类似于长官评语）栏。^[6]

这个评价，对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考试、考核制度所体现的科学的、精细化的管理，提供了一个旁证。

第三节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规章制度的特点

通常，我们审视一个学校的办学情况，大抵可以从学校规章制度的沿革中寻找其脉络。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历史上，曾经历如下几个时期：云南陆军速成学堂时期（1907—1908年）；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期（1909—1911年）；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时期（1912—1928年）；云南陆军教导团时期（1929—1935年）。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时期制定的规章制度主要有三种：1.《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铅印本），高尔登主持修订。1909年5月，日（本）陆军教练处铅印所印。2.《改订云南陆军讲武堂章程》（稿本），李根源主持修订，1910年7月。3.《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务条例》（稿本），李根源主持修订，时间不详。

《云南陆军讲武堂试办章程》《改订讲武堂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务条例》的内容深受日

本陆军士官学校教育大纲的影响，部分条款仿效或沿袭使用的痕迹十分明显。在规章制度中保留了尊君、亲上、服从的封建思想，在精神教育上传承以孔孟之道为主的精神说教。如《云南陆军讲武堂改订章程》第三章军官佐职务第三条各科长（职责）第一款秉承总办商承监督口口各该科教练员分担训育本科学生之学术。各科长尤注重养成学生严守纪律、尊君亲上、奉公守法，力尽责任之精神等，均该科长自为模范，力任其职。《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务条例》第二章服从第一条服从命令为治军之根本，务宜上下有别，尊卑毋紊，上爱其下，下敬其上，宅心公正，处事温和，不可有粗暴威迫之举动。第二条凡在下者服从其上，应极其严重诚恳，按其分限尽其恭顺，决不许阿谀取悦，以失服从之真意。第四章 拜牌 第一条 堂内设礼堂一所，中供万岁圣牌，每逢万寿及元旦节由总办率领在堂各员司及各学员至礼堂前，按照行营礼节行礼。



郑开文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三期校长的档案材料（云南省档案馆藏档）

这些条款显然是日本军事教育技术与满清政府封建思想的混合物，反映了在清政府统治下，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学、管理制度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充满了清军、绿营等旧式军队管理的气味。在胡景伊、高尔登、李根源、张开儒、沈汪度、唐继尧等大批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国同盟会员的先后努力工作下，革命党人以地下或半公开的形式进行活动，以暗示、影射、隐喻的方法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鼓吹颠覆满清政府，发展同盟会会员，积蓄革命力量，使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为颠覆满清政府统治的策源地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堡垒，为云南辛亥“重九起义”的成功作出巨大贡献。当时，以李根源为代表的留学生群体掌握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部分行政权，所制定的陆军讲武堂规章制度也隐约体现了向西方学习、承袭其合理内容的倾向。但在省级政权、军权旁落的情况下，革命派的势力非常脆弱，如李根源当总办时间仅8个月就被撤换，不可能公开张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事教育主张和理念，不可能根本改变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日常运作。客观地看，这个时期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熔炉”“革命堡垒”的特点。

郑开文主持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领导工作共4期，即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期至第十三期，时间跨度为1916年6月至1921年2月。其中，1916年6月至1919年5月为全面负责，1919年6

月至1921年2月与唐继虞并列校长。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规章制度有两种：

1.《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稿本、铅印各一种，内容相同，修订时间为1916年9月。该章程共有八章，十一节，六十八条，三十一分项。另附有《学生入伍规则》九节二十三条，《见习规则》九节二十五条，共计壹百壹拾陆条，其主要内容体现为武校的办学思想、理念以及对学校教学教育、管理、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

2.《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稿本、铅印各一种，内容相同，修订时间为1916年9月。该细则内容共有二十二章，百余条款，涉及讲武学校学生行为规范的方方面面，可谓详尽。

郑开文在日本留学时，比较熟悉日本的军事教育理论与实务，但其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所表述的教育宗旨则完全摒弃了日本军事教育的那种强调上下级奴隶般服从的“军人精神”，废除了狂热宣传为复仇、为侵略他国领土、为升官发财而打仗的“尚武精神”。创立以“国家、责任、荣誉”的大格局培养武校学生的军人精神、爱国思想，极具创意。例如《细则》总纲第二条：“应以精神为主，精神之消长即关于全军之强弱。以全身之精神振作军队，巩固国家，应以武勇信义，礼仪，军纪为主。至于服从上官，遵守命令、保持名誉尤为军人精神之基本”，秉承了章程的核心内容，即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启发式、积极进取的军人道德、军人精神的培养。这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的军事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护国战争胜利后的中国社会，民主共和的思想意识深入人心，特别是青年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思维独立，个性解放，对枯燥的思想灌输往往难以接受。新制定的章程、细则把严苛的武校管理以“防止、注意、提醒、提倡、预防”等人性化、协商式语句来表达，把“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军人应尽天职”，“干预外事足碍学术”，“不矜细行，足累大德”，“苟安怠惰徒负虚名”，“军队秩序最贵严整，应严加督率”等具体要求都以“唤起其精神，使其振奋”，或以“军人名誉关系重要，务加提倡，使知名誉重于生命，十分爱惜”等委婉词语，引导、启发学生的思考，使武校规章制度的具体要求有了更大的容量和延伸。

前面章节，我们多次看到郑开文在函电、文章中屡以“开文本武人”“开文，军人也”自诩，其对军人的自豪感、深厚感情溢于言表。那么，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规章制度中所体现的关于军人精神、军人责任、军人荣誉的教育理念以及相互间的内在联系，究竟有什么特点？

特点一，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明确提出军事教育以培养“军人精神”为主要的观点。武校新制定的规章制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教育方针把军人精神、责任（名誉）、荣誉（进取心）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在1906年《云南》杂志第一号发表的《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郑开文早期军事教育思想的萌芽：“军人爱国精神、军人的公德心（郑开文当时定义军人公德为：以个人对于团体负当尽之责任者为公德；牺牲一身以保全全体者为公德）、军人名誉教育优先于军事技术、学术教育”。这就是郑开文校长制定武校规章制度的依据和用意。如细则第一章所阐述的教育方针：

一、本校宗旨为养成各兵科军官基本之智能，授以必要之学术并锻炼身体，提倡尚武精神，以备将来补充军官之用。

二、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军官，军官乃军队之骨干，应以精神为主，精神之消长即关于全军

之强弱。以全身之精神振作军队，巩固国家，应以武勇信义，礼仪，军纪为主。至于服从上官，遵守命令，保持名誉尤为军人精神之基本。故本校锐意涵养学生之精神，戒柔懦慎学术以为他日完全之军官。^[7]



郑开文主持编撰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务细则》手稿（局部）（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影印件）

做一个横向比较，有助于我们对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育方针的理解。经过长时间积累、打磨而成为经典的美国西点军校教育方针，向被世人所称赞。据报刊载，1979年2月20日，西点军校校长古德帕斯中将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修订了教育方针的总论，规范了西点军校的使命：“教育、训练和培养学员，使每一名毕业生具备一名陆军军官所必需的性格、领导才能、智力基础和其他方面的能力，以便更好地效力于国家，并且具备不断进步的能力，继续发展自己”。显然，这个修订的西点军校教育方针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陆军军官培养目标非常接近，即贯穿在上述各项军事教育、能力培养之中，是对每一个学生进行积极进取的道德、精神、能力的培养。郑开文没有机会系统学习过美国西点军校军事教育理论，没有可能去模仿、因袭西点军校的规章制度，因为西点军校教育方针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的制订时间，两者相距63年的光阴。

军人从事的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战争，正如蔡锷编著《曾胡治兵语录》所言：“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或昼夜赶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常）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培养合格军官为目标，聚数百千之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于武校，就必须“以效命于疆场为归宿，欲其效命于疆场，尤宜平时竭尽手段，以修养其精神、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临事之际乃能有恃以不惧”（蔡锷语）。郑开文着力提倡的、最能体现军事教育特质的，就是在锻炼其体魄、娴熟其技艺的基础上，竭尽手段和气力培养其军人精神。

章程中，将“军人精神”的第一个层次表述为“忠爱国家”“爱国热心”，因为：“国家者积个人而成者也。故国家之荣辱存亡，与个人有休戚之关系。况军人者负直接保国之义务者也。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军人之与国家，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军人应该：“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袍鼓之急，则忘其身。”“视国事如泰山，视身家如鸿毛，苟利于国，虽死

亦荣；苟害于国，虽生亦辱。以此精诚，以此义烈，郁之即为国魂，张之即为国威。此中妙用，吾不知其竭几许能力，灌几许热血，酝酿胚胎，而成此心照汗青，河岳生色，可钦可敬可歌可泣之概念。夫国无魂不立，国魂者国之所赖以为国。苟无爱国之精神，即无立国之国魂。既无国魂，安问国威。若是者，吾知其虽拥百万之众，亦终无士气振奋之一日。谓之无一兵焉可也，谓之无一人焉可也。”^[8]由此可见，郑开文认为，对于军人来说，没有比忠爱国家、爱国热心更加重要的品质了。军人担负着保卫国家的责任，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军人若无爱国之精神，即没有国家之国魂，也不可能国威。虽拥百万之众，亦终无士气振奋之一日，谓之无一兵焉可也，谓之无一人焉可也。把培养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视为“军人精神”教育的首要之点，它的重要性超过了服从上官、遵守命令、纪律严明、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一类的基础要求。

在民国初期的军事教育实践中，郑开文常告诫武校教员：“故教授学术之时，须常涵养其德性，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其成为忠爱民国之良质，陶冶其成为坚定军人之志操，最为紧要。”要求教官在日常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德性，鼓舞其精气，以发挥忠爱国家的良好品质，并作为成材的考核标准。如章程第五十七条：“尚武精神、爱国热心，务力加提倡，用备干城之选。”所表达的，军人只有具备了爱国精神、忠爱国家的良质，才值得国家信赖和依仗，郁之为国魂，张之为国威。否则，他就是一个潜在的敌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为了个人私利或小集团利益，掉转枪口，自相残杀！

每个军人都具备忠爱国家，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精神，才能激发每个人最大的潜能，才能形成一支部队最强的战斗力。军人忠爱国家，既是军人精神所赋予的内涵，也是军人沉甸甸的责任。平时涵养其德性，鼓舞其精气，陶冶其成为具有坚定战斗意志和高尚情操的军人，其实这就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最有效的途径。

章程中，将“军人精神”的第二个层次表述为“巩固国家”为军人的责任。从军之苦、战争之惨烈伴随着每一个军人生命的始终，从本质上说，是军人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即以“牺牲一身以保全全体者”为军人的责任。与普通民众不同，面对残酷的战争，军人要履行保卫国家的神圣责任，需要付出坚忍不拔的勇气，甚至要奉献出血肉之躯。蔡锷曾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须以耿耿精忠之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反顾，始能有济。”这表明军人的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它是一种伟大的品格，在所有价值中它处于最高的位置。这就需要军人们在学习、训练和日常事务中，逐渐养成。只有具有执着、坚守和献身的品格，才能够无惧于战争、死亡。

即便在和平时期，军人责任也体现在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忠诚和信守，对自己承担的工作出色地完成、忘我地坚守。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相互依存的，只有所有人共同努力，郑重地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才会有生活的宁静和美好。任何一个人懈怠了自己的责任，都会给别人带来不便和麻烦，甚至是生命的威胁。家庭需要责任，因为责任让家庭充满爱；社会需要责任，因为责任能够让社会平安、稳健地发展；军队需要责任，因为责任让军队更有凝聚力、战斗力。事实上，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我们怀着一颗勇担责任的心，全心全意，尽职尽责，那么我们的事业便会变得一帆风顺，而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和意义非凡。而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或者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首先失去的是社会对他的基本认可，其次失去的是别人对他的信任与尊重，也就失去了自身

的立命之——信誉和尊严。

军人尤其如此，能够明确自己的责任并能在必要时，以生命的代价去履行使命，就是军人精神的精髓之所在。武校要求所有的学员从入校的那天起，都要以服务的精神自觉自愿地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都有义务履行自己的责任。即使在平时，也以能够承担责任的军人为勇士，与为国捐躯一样光荣。而且在履行责任时，其出发点不应是为了获得奖赏或避免惩罚，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使命感。郑开文在日常军事教育中，提倡武校师生敢于承担责任，在执行任务中，不论要面对多么艰巨的困难，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而非推卸责任。对于军人来说，推卸责任是一种耻辱。当一个国家把安危交付给他们的时候，武校师生觉得没有任何事情能比承担起这个责任更为重要和伟大。郑开文经常用一个战例诠释了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学生在战场应该如何保持军人精神和承担军人责任的：“在护国战争的叙、泸战役中，工兵连长胡岳奉命率部死守龙头山，抗击数倍于我的顽敌，全连官兵壮烈牺牲，阵地岿然不动，寸土未失。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全体阵亡官兵着装、子弹带、绑腿、军系扣与平时操场训练一样符合规定，始终保持着军人的风范。”这个战例深刻说明军人在战争时应秉承的责任，无论战争如何恐怖，军人都要履行自己的责任，随时准备为国捐躯。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军人精神赋予你坚韧的意志、无穷的力量，从生命的深处焕发精神，以勇敢者的姿态克服胆怯，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不贪生怕死、临阵逃脱。忠诚于国家，就是在战场上，面对重压和困境，军人们从不犹豫、毫无怨言、满怀信心，以坚忍不拔的军人精神、忠爱国家的无私奉献以及不可战胜的坚定决心，始终保持军人风范，必要时英勇献身，卓越地服从命令，完成自己的责任，这就是铭刻在武校学生心中的军人精神。

另外，“以个人对于团体负当尽之责任者”还表现在军队相互间的良性关系的培养上。郑开文在清末民初社会变革的经历中，深刻领会到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优良，能打硬仗的部队，是由若干个班、排、连、营、团等基层部队组成的，每个基层部队的军官，就是要将所属的每一个班、排、连、营、团凝结成为同生共死、荣辱与共的关系，无论是为了军队的良性发展，还是为了团体中每一个士兵、军官的卓越成长，都需要军人们用全部精力，甚至于鲜血、生命去躬行彼此忠爱，去捍卫忠爱的尊严。讲武学校是这样教育未来的军官们的：做你的“士兵”的坚强后盾，是建立互信与产生忠诚的最有效的途径。因为，军队中团体的忠诚不是单向的、片面的，而是双向的，既要忠诚于上级，也要忠诚于下级。一个时时维护同学、同事乃至下属利益的军官懂得，维护团体的合法权益，用自己的忠诚赢得他人的忠诚。当同事或下属面临困境时，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他说话，给予帮助，这种互相帮助的举动塑造了军校学生牢固的忠诚意识。对于武校学生来说，忠诚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它首先体现为忠于你所在的团队，尊重和帮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武校，大家信奉的是：我们这样团结起来，可以营造一种集体观念的气氛。学员们总是自觉地帮助学习较差的同学，如果某学员遇到困难，毫无疑问，过路者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这使得军校上下级的关系变得十分牢固，在战斗中显得更加紧密团结。

一个人，只有忠诚于团队，才能获得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前进的动力，才能赢得他人的支持与帮助。一个拥有忠诚官兵的基层部队必定是个高度团结、执行有力的团队。很多人都认为，选择了忠诚就意味着放弃了利益；选择了忠诚就意味着永久的奉献甚至牺牲。其实，这是对忠诚的狭隘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真正的忠诚是能够为团体和其中的每个人带来最大化的

利益，而且忠诚所带来的利益是最为丰厚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忠诚”意识和行动投资于我们的岗位；投资于我们所在的部队；甚至投资于家庭、爱情，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只不过有时候这种回报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却一定是最为厚重、最为长久的！

忠诚是军人的催化剂，只有心中充满忠诚的军人才会如此敬业，才会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不断提升自我。忠诚可以催化人的能力、智慧，在国家危亡时刻，奉献出生命的一切，成就军人的荣誉。但是，古今中外的案例都表明，能力、智慧未必能带来忠诚。所以，对于军人来说，忠诚比能力、智能更有价值，忠诚在特殊时刻，显现的价值是无比重要的。很难想象，一名士兵要是没有忠诚意识，是否还可以将最艰难困顿的任务执行到底。对于优秀的军官来说，忠诚就像是他的第二生命，丝毫亵渎不得。哪怕前面有再多的困难、再大的危险，他的心中也只有一个念头：忠于职守，听从命令！忠诚不仅是个人道德水平的体现，同时也是个人魅力的展现。没有人不喜欢忠心耿耿的部下，也没有人会喜欢随时可能背叛自己的人。在平时生活中，如果你对别人不够忠诚，别说是上司，就连朋友都会对你敬而远之，因为你不值得信赖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聪明程度便与你的危险程度成正比，人们最理性的选择当然是躲得远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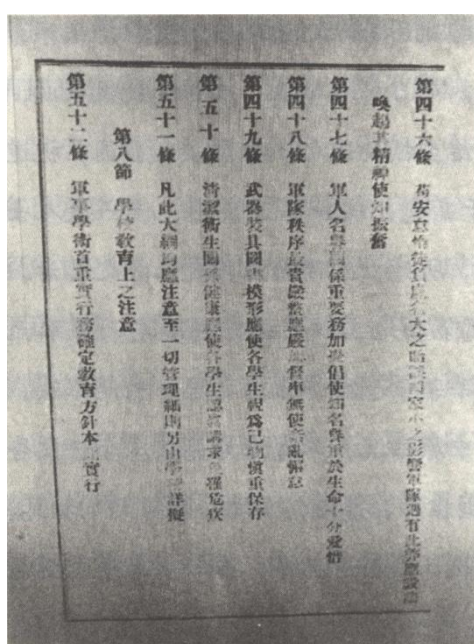
忠诚的军人是部队中爱不释手的宝贝，为了能够充分激发这些忠诚军人的潜质，部队也会为这些忠诚的人，提供最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让他们也得到最丰硕的回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生在毕业数年后，许多人都能承担重要责任，升任师长、军长者大有人在，而某些滇军高级将领能力很强，野心勃勃且擅长私利、地盘的算计，但终不为国家所用，也不能成就自己的事业、理想，就是典型案例。

郑开文对武校师生“军人责任”的讲话难寻踪迹，不过笔者还是找到一份唐继尧在云南高等巡警学校学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其中谈到军人的责任，算是个佐证。《都督高等巡警学生毕业训词》：

本都督军人也，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固吾人之天职，若夫维持秩序，保护治安、安胥与警察之力是赖诸生。今日警察毕业，本都督获观厥成，无任欣慰。然有不能已于言者，试与诸生撮要道之。粤自袁氏当国，视道德如土苴，破坏唯恐不尽，等法律于弃髦，蹂躏不遗余力，使一般人士俱无崇道德奉法律之心理。四年以来，所恃以立国而为奔走人才之具者，不出名利两途，以功名虚糜其身而气节扫地，以利禄摇撼其志而廉耻无存。遂观觊觎，士夫尽多非分之想，莘莘学子咸怀出位之思。长此不改，匪特人道渐灭，衣冠变成禽兽，比致中原陆沉，华胄沦为异族。今者彼昏不知帝制自为。本都督为民请命，提剑出师，爰本仁义之，皆与天下相见，更愿举仁义之说，与诸生相勸。诸生此日出而用世界，第一须有崇尚道德之念，第二须有恪守法律之心，盖道德为内部之制裁以法律，为外部之制裁以道德。培养其身心不复能以法律、规矩，其行为不为功名之观念所会惑及利禄之谬说所摇夺。本斯宗旨锲而不舍，担任国事，庶几有济。又况此次举义必欲达到推翻袁氏之目的，袁氏如倒，极谋建设，建设问题全赖法治，所谓法治之精神寄予警察即寄予诸生一身，诸生勉乎哉。国家多难，需才孔殷，吾侪责负荷至鉅，念前程之远大，不能不为诸生存过奢之希望而抱无穷之乐观也。^[9]

每一个人的责任连缀起来，就构成了集体的责任。作为从武校走出的军人，对部队、战友的

忠爱是这个世界上其他感情无法比拟的。那是一种永远也不会被抛弃的感觉，这相互之间的忠爱关系是一个耿直的承诺：当你受伤后躺在一个荒草岭墙犄角的地方时，你知道部队总会有人来寻找你，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这就是官兵之间、战友之间的忠爱。1912年12月8日《天南新报》载：“郑开文命令，将在平叛西藏战斗中牺牲的西征滇军士兵的遗骸迁移回云南境内安葬，为牺牲的官兵建忠烈寺，以备永久纪念。”为死难将士申报军功、抚恤金，将援藏平叛战斗中负伤治疗的战士予以照顾，分别轻重，在省内各地设置疗养院，妥善安置这些伤病员，等等。都是对官兵的集体主义、互相忠爱的教育。凡是战争都避免不了伤亡流血，但是每个人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是军人的责任，是军人才能享受的荣誉。实际上，当一个人怀着宗教一般的虔诚去对待生活和工作时，他是能够感受到责任所带来的力量的，只有那些能够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才有可能被赋予更多的使命，才有资格获得更大的荣誉。



郑开文主持编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铅印本，局部（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提供）

在郑开文领导的武校或部队中，教官（指挥官）与下属之间讲求“忠爱”的具体信条是信赖、忠诚和尊重。郑开文经常引用“带兵如父兄带子弟”的理念，“无论为宽为严为爱为憎为好为恶为赏为罚均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至公无私。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此言殊亲切有味，然实按之此第二家庭较之固有之家庭，其关系密切孰将过之，何以。故长上之教育部下也，如师友其约束督责爱护之也，如父兄。部下不对长上也，其恪恭将事与子弟之对于师友父兄之无以异耳。及其同临战役也，同患难共死生，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靡不与共。且一经从戎，由常备而续备，由续备而后备，其间年月正长，不能脱军籍之关系，一有战事，即须荷戈以出，为国操劳，此以情言之耳。国为家之集合体，卫国亦所以卫家。军人为卫国团体之中坚，则应视此为第二家庭为重，此义言之耳。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悖用兵之本旨也。”^[10]例如，民国元年参与援藏平叛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官兵中走出多位在护国战争、护法运动、抗日战争中驰骋战场的骁勇将领，如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参谋长姜梅龄成为驻川滇军参谋长。第一纵队副官江映枢成为驻粤滇军第三师参谋

长、后晋升为上将。第一大队长张贵祚成为都督府少将参议。第二大队长华封歌成为滇西防军司令。被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盛赞的西征滇军二等参谋高荫槐，在抗日战争中成为抗战著名将领，他率领滇军第六十军 183 师坚守台儿庄阵地，全师血战 27 天，战斗中伤亡失踪 6271 人，战损比例达 54%，但阵地不丢，防守一步不退，为友邻部队围歼日军精锐矶谷军团赢得宝贵时间，为取得台儿庄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些案例，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郑开文带兵之道。

特点二，军人名誉与军人责任的辩证关系。郑开文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历史上首次提出“军人名誉重于生命”的军事教育命题，完全是以提高军人素质为出发点的。章程第四十七条指出：“军人名誉关系重要，务加提倡，使知名誉重于生命，十分爱惜。”在《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文章中，郑开文对于军人名誉曾有如下阐述：“军人之光荣，亦未始非公德心所勃发而效果者也。夫保存国家之名誉者为军人。军人之名誉，奚啻国家之名誉。名誉之丧失，即国威之堕落。噫！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即肝脑涂地，亦无最后之降服。”^[11] 跻身于铁血行伍之中，以人类最为残酷的战争为职业，若想在战场上履行保卫国家的责任，你就必须在平时锻炼成为一支虎狼之师，培养出一大批渴望立功受勋的威猛将士，才能披坚执锐，攻城略地，克敌制胜，完成军人的神圣使命和担当，军人名誉才能够名副其实。

郑开文深知，通过激烈竞争、严格考试，层层挑选的武校学生，包括华侨学生、邻国留学生，每个人都有成为优秀军官的潜力，甚至每个人都有成为将领的潜力。通过长时间实际战争的磨砺，能够带好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历练成为一个团、旅、一个师甚至更高职位的将领。讲武学校的教学、教育的任务就是把这种潜力发掘出来，让每个学生都充满了成就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攸关国家、人民、社会这些重大使命放在心头，并为这种蓬勃信念随时做好准备。武校倡导“军人名誉重于生命”的教育，赋予了武校学生热情、自豪和追求卓越的能力，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使每个学生对训练和学习都充满了热情，驱使他们努力做好每一次训练、每科学业，并且要追求最优最好，不敢有丝毫懈怠。

日积月累的持续教化就可能转化为强烈、持续的内在动力，帮助每个学生完成极其艰苦的训练和学业，取得良好成绩，进而影响学生的一生。郑开文用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和手段，烘托、营造出一种“天降大任于我”“舍我其谁”的浓厚氛围：他们即将成为披坚执锐地伫立了很久、在静静地等待着国家召唤的前线将士，随时准备为保卫国家而战，用生命和热血去履行军人承担的责任，实现军人的荣誉和辉煌。

曾经留学日本的革命党人郑开文熟谙舆论宣传对扩大讲武学校的声誉及提升学生使命感、荣誉感的巨大作用，首次将陆军讲武学校第十期毕业的学员，按在校学习成绩的高下为凭，授以上尉、中尉、少尉军衔的消息，刊登于 1916 年 9 月云南《义声报》上：“讲武学校第十期学生毕业情形曾志本报，兹闻郑校长现具呈督军署，请将毕业各生按照成绩之高下酌量给以上尉、中尉、少尉等职，惟应俟分派人各团营后，考验其操行一切与在校成绩相同，方授以实职，并闻派入各团营服务期即在数日之内云。”当时各地军校学生毕业后能授予中尉军衔已经是最高等级了，而郑开文校长对其学生的水平甚为看重，建议督军唐继尧把学生毕业分配及按在校学习成绩的高下，破格擢用，授以上尉、中尉、少尉军衔。将荣誉激励措施落实到培养、教育的每一步，其用意可见缜密细致。

特点三，军人名誉与忠诚国家。郑开文主持制定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育方针，十分重视爱国主义与军人荣誉的施教，并把两者紧密地融为一体，他曾撰文强调说：“夫保存国家之名誉者为军人。军人之名誉，奚啻国家之名誉。名誉之丧失，即国威之堕落。噫，有死之荣，无生之辱。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即肝脑涂地，亦无最后之降服。彼执侵略政策吞噬手段者，吾知其必闻风而靡，为三舍之退避，而狼子野心，亦归于消灭矣。”即军人的名誉来自保卫国家的责任，军人的名誉关乎国家的名誉，军人名誉丧失，即国威尽失。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人抱有为国献身的信念而无偷生苟活的思想，不为不义的敌人所屈服，即便是肝脑涂地，亦无最后之降服。一个国家的军人如果都具备这样的精神、气魄，侵略者必不敢贸然行事。

郑开文总结其军旅生涯的经验认为：“军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对军队的忠诚度越高，共同达到团队目标的动力就越强，团队达到目标的可能性也就更大。”要求军人只有时刻把国家放在心头，忠诚于国家、民族与人民，才是一名合格的军人，才有可能在战场上或和平时期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即便在平时，郑开文对武校师生国家观念的教育灌输也如春雨润物，涓涓细流，力争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优秀的爱国者。郑开文讲话的课件、报道都随岁月而流失殆尽，但是郑开文校长和教官们对学生进行“国家、责任、荣誉”的教育、灌输的效果，依然可从学生的言行、文章词语中反映出来。

其一，花名册上的打油诗。1926年，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三期留昆同学编写了讲武学校第十三期师生名册，其中在末页有一首打油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哥哥弟弟好同胞，同声高唱风怒号。
壮如荆卿别易水，又如武穆歌宝刀。
一枪关系国荣辱，一饷莫非民脂膏。
出不杀敌誓不返，无功生还非英雄。^[12]

由此可见，对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师生来说，崇尚荆卿为正义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岳飞精忠报国的豪迈气概，正是他们效仿追求的榜样。深知每个军人承担着保卫国家荣辱的责任，是人民的脂膏养活了自己，为人民、国家解纾危难、建功立业是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二，毕业证上的印花税票。2016年8月，笔者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时碰到一位中学生提问说：“贴在讲武学校第十一期毕业证上的邮票是什么含意。”我告诉他那是张印花税票，不是邮票。这是份贴有粉红色长城图案、面值伍角的印花税票并由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长郑开文签发的毕业证，其特别之处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份贴有印花税票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生毕业证，它所折射出的讲武学校学生的思想品质却十分耐人寻味。印花税是一种古老的税种，1624年起源于欧洲荷兰。中国印花税制度始于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余年间，大清帝国拟开征印花税，虽先后印制了日本版和美国版的印花税票，也拟定了“印花税则”十五条，但终未能正式实施。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把推行印花税作为重要的聚财之举，于1912年10月21日公布了《印花税法》，并于次年正式实施。从此，印花税一直被民国政府视为重要财源，军阀割据的省份和各地方政府，更将印花税作为筹措军需的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有些地区暂时沿用民国

政府旧法，有些地区制定了单行办法，继续征收印花税。1950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公布《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全国税政，确立了印花税为全国统一开征的税种之一。所以，东、西方国家都把征收印花税象征着国家权力的施行。在护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民国政府表面上还在正常履行国家权力，武校学生在毕业证上贴上印花税票，表明该学生是按国家的要求履行自己的纳税义务。长城图案的印花税票是民国发行的第一套税票，以银元计价。要知道，当时的伍角钱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伍角钱可以买到几十斤大米或可以在饭店里饱餐一顿呢。民国的印花税实施不久，身在边疆的人们知道印花税的人不多，多缴少付也没人查证，足见该生高度的、强烈的国家意识，纳税自觉性十分的可爱，通过履行纳税义务表达报效国家的品德，也表明这张经过国家认证的毕业证凭信效用。试问读者诸君，相信每个人都有不同形式的各种毕业证，你的毕业证上有印花税票或缴纳印花税的标识吗？老实说，笔者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思维，证书上自然没有贴过印花税票，比之百年前的这位学生，自感惭愧呐。毕业证书上贴用印花税票，小事一桩，如同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所提醒的，一名军官只有时刻把国家放在心头，忠于国家与人民，你才是一名合格的军官，才有可能在祖国需要时甘愿冒着牺牲生命的风险去履行军人的责任，实现军人的价值。我想，这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人精神教育的效果之一吧。



郑开文签署的武校第十一期学生毕业证（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提供）

顺便说点我参观云南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的另类感受。在博物馆展板上，我注意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学生毕业证上图案的微妙变化，不吐不快。郑开文执掌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时，其签发的毕业证上方图案正中是画有经纬度的地球仪图案，地球仪右侧是民国红、黄、兰、白、黑五色民国国旗图案，左侧是十八子星军旗图案。寓意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是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或者寓意学生应以国家安危为己任。1919年5月，郑开文暂时离开武校任职于广东驻粤滇军，武校第十二期以及尔后的学生毕业证，其正中间地球仪图案镶嵌了督军唐继尧或龙云的肖像，将武校为国育才的境界变了味。贴有地方当权者个人肖像的毕业证是否表明个人崇拜或育才私用的倾向，我说不好，只是觉得把地球仪位置印上个人肖像有点过分，搞得不伦不类，明显是个败招。此为以“东大陆主人”自诩的唐继尧是否涉嫌存有帝王野心提供了一个异样的注脚，亦是对唐继尧后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时，兵革不断、内江频频的实况提供了一个研究样本。

特点四，军人精神的养成——严格的军纪。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人精神”教育的另一重要

方面，就是军纪严格。旧时中国军队中普遍存在纪律散漫的现象，被郑开文称之为军队的“毒病”。他曾尖锐指出：“现今一般状况，多误会共和主义，系为平权自由，可以漫无纪律，遂至各军队中多为所传染。凡一切指挥命令均难实行，几无军纪、风纪之可言。此为最大毒病。各队长、教官于此一层弊端，遇有事物，须不逸其时机，引喻证明，令其醒悟，尤为紧要。例如汉阳之失败，此其一也。”^[13]“汉阳之失败”是指辛亥革命武昌保卫战期间，以中国同盟会领袖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指挥缺乏武器装备且组织、训练欠缺的民军对抗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清军正规军的攻击，固然勇气可嘉，精神、道义上也占有优势，但仍不敌清军的进攻，相继失去汉阳、汉口两大重镇，武昌岌岌可危。其中最让黄兴总司令难以忍受的就是民军的漫无组织，纪律松懈，作战能力低下。虽有黄兴亲临前线督战，前方稍有失利，队伍马上全乱，部署尽失，督战队用机枪扫射都挡不住败兵如潮水般溃退。甚至于每到夜晚宿营时，军队的编制、部署马上被打乱，竟然是军官到处找安乐窝，本地士兵跑回家睡觉，再次召集起来组成战斗行列简直难上加难。黄兴等人策划的夜间侦察、突袭等战术根本无法实施，打败仗自是情理之中。故，郑开文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推行严格的军纪教育，特别强调军纪、军风的教育是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作为军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会服从。军人必须服从，不会服从，不养成服从观念和习惯，就无法在军队立足。因此，服从观念要在讲武学校学员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忍受不了“服从”这种军人特殊的美德，就请走人。执行任务，不找任何借口地去落实，这是千百年来每个士兵乃至将军最基本的职责。军人的天职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全力以赴地完成，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即便是现代的竞技运动，也体现了团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每个运动员都须严守规则，服从教练指导，平时的艰苦学习、刻苦锻炼就是为了有能力承担自己的责任。如足球项目，11人的团队是一个整体，然而分工明确，每个位置的球员各守职责，不能越位、擅自行动，每个球员还必须是这个位置上能力最强者，才能攻如行云流水，撕破对方防线；守如铜墙铁壁，让对方无懈可击。倘若哪个位置的队员缺乏能力或擅自行动，那球队必遭全队覆没之灾。

军队尤其如此，上司的权威，代表着军队所有人员的整体利益，不允许部属抗令而行。整体的巨大力量来源于个体的服从精神，上级的意图通过下属的服从将会变成一股强大的执行力。无条件服从是一种军人自信与勇敢的体现，是勇敢负责和果断执行的前提，表明一个军人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的认知程度。思想影响态度，态度影响行动，一个服从命令、不找借口的军人，肯定是一个高度负责和执行力很强的军人。下属服从上司，是上下级开展工作，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前提，是融洽相处的一种默契，也是上司观察和评价自己下属的一个尺度。对于命令，首先要服从，执行后方知效果。还未执行，就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大谈见解和不可执行的理由，走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角色。对于有瑕疵的命令，首先还是服从，在服从或事后与领导交流意见，就是完成任务后的总结。这种总结是尤其可贵的，它让你更成熟、更优秀，并逐步显露出你的价值。军队就是如此，在服从、执行、总结的过程中攻克一个个目标并相应调整策略，为完成下一个任务做准备。下级在接到命令时，“保证完成任务”是他们唯一的选择；遇到困难时，他们要努力寻找方法，解脱困境；违反纪律时，他们要勇于承担责任；面临挫折时，他们还要挺身而出。

军官只有让士兵们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才有可能塑造出一支纪律严明、执行有力的威武之师。因此，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放弃任何借口，放弃惰性，摆正自

己的位置，调整自己的情绪，让目标更明朗，让思绪更直接。为了使新学员具有这种坚定的服从意识，武校对军纪的要求甚严，如《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第六章学校管理及教育中的“注意事项”如下：

第七节 学校管理上之注意：

第四十三条：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军人应尽天职，应切实教管各学生，使不致于犯罹罪。

第四十四条：干预外事足碍学术，应制止学生不可明知故蹈，致碍进度。

第四十五条：不矜细行，足累大德，应随时训诫，无使稍有过失。

第四十六条：苟安怠惰徒负虚名，大之贻误国家，小之影响军队，遇有此弊，应设法唤起其精神，使知振奋。

第四十七条：军人名誉关系重要，务加提倡，使知名誉重于生命，十分爱惜。

第四十八条：军队秩序最贵严整，应严加督率，无使紊乱、懈怠。

除此之外，武校还周密设置了近乎残酷的训练和各种场景，培养严守军纪的习惯。在平时学习生活、训练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自由”，不准保留有任何最基本的个人物品，不准保留任何代表个性特色的象征之物。今天，人们参观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时，看到学员宿舍的情形就是复原当时的状况：一个排或一个区队集体的宿舍，所有铺位是一模一样的，除洗漱用品外，几无存储个人物品的地方，无一处个人隐私可藏。在最初入校的几个星期里，所有的新学员都像新生儿一样，其待遇、装束都是相同的，几无任何显示独立个性的特征。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有一本内部期刊《日记》，其中一篇日记记录了入伍生第一天到校的情况：

日记：民国六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一，天候 晴

督军署送前考取军官候补生（共六十名）入补充第一队入伍练习，是为入伍生。本日午前十时，各候补生成执行盥漱具先后入队报到。经王队长季莲、俞队附雨苍点名验像后由各排长按各候补生身干次序权编为四排，（每）排分为二班，（每）班各有助教二（人）。然后按班集合，命后列向后退；向左右展开，各对正一床铺，将盥漱器具置于本己床头之下。乃各就坐床头休息。顷之由各助教发给寝具（棕垫一，被一，红毡一，枕一，白垫单一），服装（军帽一顶，单衣、夹衣各一套，棉背心一袭，皮带一根，皮鞋、布鞋各一双，一等兵肩章一付（副），领章一付（副），符号“补”“工”二字），军用品（饭盒一，水壶一，干粮袋一，针线包一）等毕，命于所领物品上标记各人之名姓或暗号，以便认识。其衣裤上纽扣重新绽缝，以防脱落。然后由本班助教指示军用品之安置所，衣服、被盖之折叠法，肩领章及符号之绽法等毕。乃将普通服卸下，暂寄于上士室，遂齐着戎装，彼此相视，俨然一军国民矣。午后五时晚餐，先由值星助教集合于队本部前，宣布食堂规则大要，始带入食堂，各认席号而立，每七人一席。……^[14]

郑开文对于军队服从命令、执行军纪的要求至为严格、详尽。1920年11月16日云南《义声报》载有一篇随军记者的通讯《自省会至马龙之纪事》，记载郑开文率警卫军从省城昆明至马龙县的行军轶事：

余于十月十七日随警卫司令出发北征，是夜宿大板桥。……十一时至白塔铺，昨夜预定本于

此休息午膳，至则厨司、伙夫等均未在此，因步出郊外与司令官席草而坐，谈及今日军队习气，司令官疾首蹙额，以精神缺乏为虑，因言警卫军为军队模范，此后誓从根本整顿，以祛积习。乃复进行至黄土坡休息，始知厨司等以白塔铺无米可购，就此为炊，故移地点。……膳后，司令官因感于日间野外之言，集合大小军官，严加训诫，告以军人天职，示以整顿方法，即军风、饷纪及精神之振刷，命令之服从尤为注意，语长不及尔尔，训诫毕业已九时，因次日道长，遂各安寝。

又如：强调军队驻地纪律的《警卫军驻宣威之文告》（载于云南《义声报》，1920年11月15日）照录如后。

维持军纪之布告：靖国联军警卫军司令部布告：照得大兵驻在地，往往兵民相杂处，若不及早申禁令，难免不兢相欺侮，兹特明谕，尔兵民务各守业安本分，兵不得擅入民家，民不得杂与军相混，倘敢杂聚相赌博，抑或引诱相淫酗兵，由本部重惩罚，民送县令加管押，兵民各自有区别。本部时派有密查至，若买卖相交易，彼此尤贵守公平，民不得高抬市价；兵不得短折钱文。须知兵民原一体主客，务各申感情，兵由本部加约束，民由县令示详明。本部言出法朗，随察觉，惩办罚匪轻，自经明白晓喻后，兵民其切切凜遵。

郑开文把军队日常事务与国家体制联系起来，规范基层部队的行文，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1920年10月16日，郑开文率警卫军驻军云南宣威，曾发布《警卫军驻宣威之文告》，其中一则刊载于云南《义声报》1920年11月16日，第五页。就是关于部队来往公文的规范《令各队来往公文之毋得省略及改值星为值周文》：

查军语以直截了当为佳，然尝见有奢省略而反误事机者。各部队公文函电写步兵第二营、第三营是明明只有两营，倘将第字省略，仅写二营、三营，则二加三岂不共有五营乎。平时相习成风，未尝不可，及至临战难免部位省略所误。因小失大，貽患何堪设想。自经通令以后，凡写军师、旅、团、营、连、排各队号均须冠第字于数目之上，以免貽误。又，民国改用阳历，以日月水火木金土各罗列于日字之下，周而复始，故以此七日称为一周，乃竟有相沿而称星期者，且有以日曜日为星期日，以月火水木金土六曜日而称为星期一、星期二及三、四、五、六者。果同所据而云。然假令将一、二、三、四、五、六各数字冠于星期两字之上，又岂不相悬别。甚至有沿用教门习惯而改称星期为礼拜者，尤属谬妄已极。况我民国人应遵用民国历，此一定不移之理。以后，着一律将值星改为值周，并将每周照民国阳历改称日曜、月曜、火曜、水曜、木曜、金曜、土曜。以重国体而杜覬觎。

我们从小学起都要轮流值日，班干部轮流值周，这个“值日”“值周”的说法是不是从郑开文提议开始的，没有人考证过。不过，郑先生居然把习以为常的日期变相说法上升到有关军队事务、关系到国体及防止西方教会文化的浸染，杜绝西方国家的覬觎，倒是闻所未闻。可见，郑开文对培养军人的用心良苦，甚至于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特点五，为荣誉而战，就是最完美地履行你的责任，让为荣誉而努力成为一种习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第一章第三条指出：“凡学生之荣誉即关于全校之荣誉，故各学生平日躬行虽有上官时常监视，究不如学生自行砥砺，互相戒飭，以维持荣誉。”军人的责任和荣誉是军

事教育伦理观的基本成分，它既是军校培养的终极目标——培养出能够承担保卫国家责任的军官，也是通过军人的殊死奋斗获得报效国家的荣誉，即合格的军官以自己的能力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去承担保卫国家的责任，才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军官。

那个时代的军官，是一种荣誉，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好职业，也是废除科举进阶后，青年知识分子实现人生目标的捷径。云南讲武堂师生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建立民主共和国家而转战南北，浴血奋战，战果辉煌，涌现出许多骁勇善战的军人和众多功勋卓著的将领，引领了那个时代的价值观、荣誉观，为社会大众竞相膜拜。但是，军人的责任和荣誉源自国家，军人必须以军事生涯为依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需要部队这个平台去完成内生的利益驱动，满足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实现人生目标的宏大志向，获取自我实现的人生最高境界。

例如，郑开文主持操办的新生入学典礼，可谓是撞击心灵、激荡情操的军人荣誉教育之典范。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开学典礼上，唐都督，郑校长分别骑着黄、白军马威严地检阅学生方队，整洁的将军服饰，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勋章、绶带，叮当作响的马刺、佩剑，一声令下，万众景从的壮观场面，可谓尽展军人神采、豪气，着力烘托了军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可惜，笔者至今没有发现郑开文校长主持讲武学校重大典礼的实况报道，作为传承有序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重大典礼的场面和特点，依然可以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九期开学典礼的报道中一睹风采。1928年8月27日云南《义声报》报道：

1928年8月15日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新学期开学的日子，为此滇军将领胡子嘉（胡若愚，字子嘉）决定出席第十九期学员的开学典礼。8月15日上午9时，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首先齐声唱响了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校歌：“风云滚滚，感觉那黄狮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作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但凭团结力，旋转新乾坤。哪怕它欧风美雨，来势颇凶狠。练成铁臂担重任，壮哉中国民！壮哉中国民！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凭双手撑住苍穹。睡狮昨天，醒狮今天，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裔神明胄，天骄子，红日正当中”。这首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校歌被整整450名英姿勃发的青年和253名轮训军官齐声高唱着，声震昆明，道旁万人侧目。“咚！咚！咚！……”随着整整十七响礼炮，胡子嘉站到了军校大会场的中央礼台上，看着整整齐齐的队列，胡子嘉心潮澎湃，这是滇军的希望，也是他胡子嘉自己的腹心，是自己以后立足的本钱。原本准备了讲话稿，而且还都背熟了，没曾想一激动全忘记了。“各位同学，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19期开学了。今天，站在这里，我仿佛看见在不久的将来，从这里走出无数的将军，在保卫国家争取民族自主的战场上挥洒热血，建功立业。可能有人要问，军队存在之意义何在？很简单，保家卫国！别小看这四个字，往小了说。是保卫自己的家人免遭侵略伤害之苦。往大了说，军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脊梁！而你们肩负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是高举民族崛起之旗帜，为建设一个民族富强之新中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说到“前进”二字时，胡子嘉完成了自我催眠，兴奋的举手狠狠往下一挥！此刻，本该是事先准备好的主持上场的时间！不过好像已经不需要了。数百名学员，无一不热血沸腾，不用组织便异口同声，整齐的高呼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山呼海啸，气势惊人！随着总司令微微的抬手，整齐的戛然而止。短暂的压抑后，“人不免一死！然，死有轻于鸿毛，有

重于泰山！为个人利益而死。轻于鸿毛！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死，重于泰山！各位同学。当你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走出校门，成为一名光荣的战士时！我将带着你们奔赴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战场！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战斗！去死！你们没听错，是去死！那么！各位同学，请允许我这么说：“用我们的流血牺牲，换取滇军的战无不胜！用一代战士年轻的自强不息的生命，杀出一条中华民族复兴的血路；去搏取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的那一天！”

演讲短暂停歇，气氛被顶到了最高点！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目光汇聚于一点。等待最后惊天的爆发！胡子嘉停了停，风从他面颊轻轻的刮过，传来了从未来带来的消息，仿佛冥冥之中有人在跟他说些什么，抬起头大声的宣布着：“保境安民、富国强兵、抵御外辱、卫我国权、扬威中华！”所有人都静静听着，整个操场鸦雀无声。“保境安民、富国强兵、抵御外辱、卫我国权、扬威中华！”突然间有如火山爆发一样，整个操场上数以百计的现役、未来的军官们口中都爆发出相同的口号，云南讲武学校的第十九期的新学员们沸腾了，激烈昂扬的口号被他们反复的颂咏着，声音响彻云霄。这一天，永远铭记在滇军的军史上！

总司令的讲话，激励了一代年轻人，指引了民族复兴的方向。在这狂热的气氛中，胡子嘉一个立正，给在场的所有人恭恭敬敬的敬了一个礼，胡子嘉大喝着：“我宣布云南讲武学校第十九期正式开学！”。“敬礼！”值星的教官声嘶力竭的吼叫着，齐刷刷的挥舞着臂膀举了起来。随即雄壮的军乐响了起来，胡子嘉的警卫团踏着鼓点为在场的所有人展示了什么叫做铁的纪律，什么叫做钢的作风。看着正步通过主席台的警卫团矫健的雄姿，不光是学员们，就连胡子嘉身后的那些主官们眼里也冒出了星星。等到警卫团完成通场。又是学生兵组成的步兵团、炮兵团、工兵团派出地标兵后，依次通过操场。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司仪大吼一声：“授旗！”几个学员代表和区队长鱼贯地登上主席台。胡子嘉从身边的司仪手中接过队旗捏着手，扫视着这些未来的精英。“恪守纪律、令行禁止、有进无退、不离不弃！”在台下的学员们大声地背诵着学校的格言。在这激动人心地时刻，胡子嘉冷静地将手中的旗帜一展，迎风挥舞了几下，随即递给了各区队长。区队长接过队旗，身后的两名学员代表向队旗和胡子嘉分别敬礼，胡子嘉回礼。接下来是第二队、第三队……十队都授完。这10个人扛着旗又绕场一圈，这才回到了各自的队伍当中。“立正、敬礼、礼毕。解散！”伴随着司仪地大吼声。各区队高唱着校歌鱼贯而去。这场激动人心的军校开学典礼这才宣告结束。

这激动人心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开学典礼，我不知道诸君读罢有何感受，反正我是服了，百年前的一场开学典礼，至今还能带来心灵的震撼，真是不多见啦。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开学典礼后，华侨学生叶剑英十分兴奋，他在给弟弟叶道英的信中满怀信心地写道：“当今天下混乱，乃英雄吐气之时。有胆识、有军事技能者为前驱，有文才、有谋略者为后盾。”他决心学得文才武略，将来在疆场上一吐英雄豪气。也就是在此时，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入学后，首先接受学校、督署的考试和身体检查。他以各科优良的成绩，再一次通过了考试，然后接受入伍训练。新生训练极其紧张严格，经常野外训练，有时夜里还有紧急集合。这让叶剑英刚很不习惯。逆境、困顿时刻往往能看出个人秉性的区别，他以坚忍的毅力经受着艰苦生活的磨砺。

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叶剑英转为武校的正式学生。第一学期学习普通学科，第二学期他被

分配到炮科。炮科除学习专门的技术科目外，还进修共同科目军事教程。主要包括战术、筑城、兵器、枪剑术、地形、交通、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实弹射击、军制、卫生、马学、马术、战时国际法等。叶剑英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刻苦钻研基础理论知识，努力学习和掌握军事技术本领。

在讲武学校，争取荣誉是每个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军事学习、训练、体育活动的内在动力。只要有人得到全校性各种活动的前列排名，如操练、军械、武术、各类球赛、文章诗赋等的冠军，就能成为学校的明星。荣誉、奖励、机会就会源源不断地降临在他的身上，他的未来也因此跟其他的学生不一样。刚入校的叶剑英同学，为人豁达，敏而好学，苦学苦练、尊师重道，校长和教官都很器重这个华侨学生。当时学校有一个日本教官铃木中校主授兵器学并兼任劈刺教官，30多岁，个头不高，身强力壮，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喜欢同别人比试。他一连打败了几个教官，便趾高气扬起来，自以为全校无敌。许多同学都不服气，叶剑英也暗暗憋了一口气：难道中国人就这样无能，甘拜下风吗？他决心教训教训这个蛮横的日本人。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同寝室一个同学讲了，得到对方的支持。此后，一连几个月，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上练习对刺。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请教别的教练，使自己的劈刀术很快便名列前茅。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他们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叶剑英找到那位日本教官，要求比武，对方满口应承。正式比武这天，许多学科的教官和学生都来围观，他们无不希望叶剑英能够取胜。比武开始，日本教官气势汹汹地向叶剑英猛刺过来，企图以快取胜。叶剑英采取守势，不慌不忙，左右闪挡，避开他的刀锋。双方经过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叶剑英待对方力气用得差不多时，突然转守为攻，用熟练的刀法，对准他的要害部位猛劈，使他一下乱了阵脚，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日本教官试图摆脱困境，使出绝招，再次挥刀劈来。叶剑英以攻对攻，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举刀凌空而下，向对方劈去，对方挥刀上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下面，并加劲下压。这时，只听那位骄横的“武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承认比输了。事后，这位日本教官将他随身佩带的战刀送给叶剑英，表示钦佩。这把战刀，叶剑英后来一直保存在身边，舍不得丢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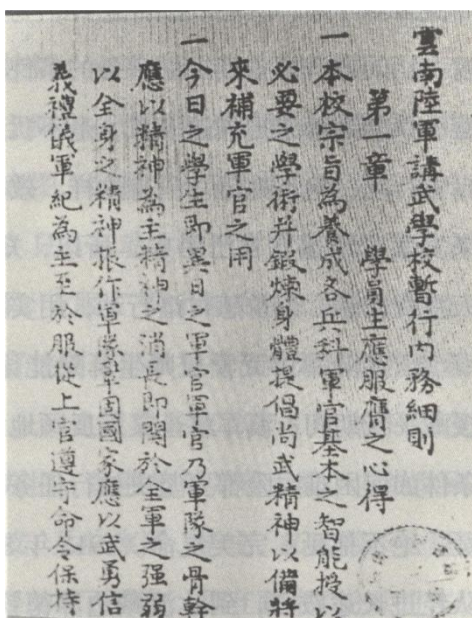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特殊的荣誉，凡是排名在各兵科前三名的讲武学校毕业生，都会在毕业典礼上得到由云南督军、省长直接授予的毕业证书和奖品。学生们知道，荣誉的光辉可以照射一个人的一生，荣誉是人生中的最大资本，有了它，你才可以赢得别人的信任和尊敬。一个名誉扫地的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排斥，很难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以及拥有和谐的社会关系。

2016年秋，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为五华区文物管理所原所长杨安宁先生举行了一个捐赠文物仪式，捐赠的物品中除滇军行军马灯外，还有一件已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的1919年叶剑英在讲武学校的毕业照片原件。这张毕业照是前几年杨安宁先生在古玩市场偶然发现的，被杨先生一眼便就确认是当年青年叶剑英在昆明艳芳照相馆留下的珍贵影像。照片右边是青年叶剑英用毛笔一笔一画写的题词：“唐继尧师长惠存”。肖像左边写着：“云南讲武堂第拾贰期第玖名学员叶剑英拜赠”。该幅照片已被收录进2015年出版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图片集），据悉这是目前云南讲武堂博物馆收藏到的唯一一件国家二级文物，是继叶帅的毕业证之后的第二件“镇馆之宝”。“云南讲武堂第拾贰期第玖名学员叶剑英”字样和叶帅毕业证书标明“第十二期炮兵科学生最优秀”

的评语，这是对叶剑英在讲武学校学业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褒扬！同时说明年轻时的叶剑英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很有自豪感。当个人的成功和荣誉到来之际，他首先想到的是把毕业证书和毕业照寄赠给最亲近的家人和师长，至为人之常情。

上述照片是叶帅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生活的痕迹，这些并非“公事”的小事有明显的时代印记，是人性至诚的流露。一则说明讲武学校的学生们并非不参加社会活动，二则说明华侨学生对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对云南人民心存感恩之情。

郑开文军事教育方法的不同之处正是用军人精神的引导，荣誉的激励，人生价值的实现等精神层面的教化，去组织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教学、教育活动。军人荣誉肩挑着责任和国家，这是一个内在联系十分密切的逻辑，荣誉起着某种完美催化的作用，这一作用既可以使忠诚、爱国的精神长存，又可以提供一种度量责任履行程度的天平，其内涵的延伸和示范，远胜于枯燥、烦琐的规章条例的说教。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对于“军人精神”的教育方法、课程设置，与其说它是一种策略或目标，不如说它是一套价值理念的传播与实践。武校学生在校受到的军事教育，就是将这种感悟制度化、强化，成为每一个学生融化于血液中的本能。



郑开文主持编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手稿（云南省图书馆史料）

特点六，以提高战斗力为核心的军事术科教育。郑开文针对民国初期军队官佐中存在着“好说大话空话的习性”，轻视实践的弊病；存在着“好作参谋帷幄之官”而轻于带兵行军打仗的实际操作，甚至认为能看几本军事书籍就能成为军官的思想、习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法。要求在各术、科教学中“对此种习癖专在各队长于术科训育时，随时随地痛加针砭，遇事责其躬行实践，令其恍然自悟，最为紧要”，并列为提高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此，郑校长亲力亲为，屡以民国以来历次战争中的亲身经历、教训为案例，竭力培养武校师生的行动能力、执行能力。告诫师生仅仅有思想、想法是不够的，强调“遇事责其躬行实践”，必须付诸行动。如果没有行动，思想、想法永远像空中楼阁、海市蜃楼那么遥不可及。郑开文有句名言：“军队主要之点战斗也。故军事教育亦以战斗为基准。而战斗动作之要领，在容许其适度之独断专行，以促攻击精神之发达，其他惟要求指挥之统一，动作之协同，以防其泛滥而全其成功也。故本校教授及

训育，始终不外此要旨，以期养成活泼有为之军官。”郑开文从实战中感悟出的经验，就在于他从来不跟在别人后面，在感觉没有机会的时候就去寻找另一条通往成功的路，而是迅捷、及时、准确的行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敌人措手不及，才能把握战机，争取战场主动权。其实就是培养军人的创新、创造能力，这是严酷战争的准则，军人的准则，是军事活动中最宝贵的基础战力。

身临战争环境的军人，接受命令时的冲动是第一灵感，不需要考虑领导决策对不对，具备的条件怎样，马上执行才是第一位的。如果等到你问清一切问题，筹备到一切必备的条件，最佳时机可能早已失去。聪明的军官士兵就是善于把握这一点，毫不犹豫地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行动、自觉行动，绝不拖延。只有这样，效率更高、效果更出色，才能将成功的果实紧紧地攥在自己手中。所以，郑开文校长深谙这一点，常常启发军人将责任感、荣誉感付诸行动，用实际说话，以实实在在的战斗力的说话。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师生耳熟能详的一个战例，深刻诠释了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期间，滇军将士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责任，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困难艰险都要坚决执行任务，无条件地执行，马上行动，绝不迟疑、绝不拖延，完美复命。1912年8月初，郑开文率领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滇藏边界德钦县。彼时，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身处雪域高原腹地，严重的高原缺氧、寒冷、疾病，导致部队大幅减员。大江大河、雪山冰峰的阻隔，与滇军督都府、西征军司令部早已断绝联络，深陷兵疲马乏、粮草俱缺、孤军无援、寸步难行的境地。此时此境，西征滇军第一纵队郑开文联长、姜梅龄参谋长大可找出上百个理由，辩解继续进军西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停止进军西藏、驻守滇边的权宜之计，几乎会是人人认可、堂而皇之的理由。但是，如果就此停止，将是整个援藏平叛战役中最不可取的策略，本可获得成功的援藏平叛战事将就此变得复杂，西征滇军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愿望将因此变得毫无希望。更意味着西征滇军在以后的战争中将一事无成，一无所获。在郑开文看来，要完成援藏平叛的艰巨任务，此时出击藏区重镇盐井、毕土是关系到西征滇军生死攸关的一战，是走出困境、治愈恐惧的良药，如果犹豫、拖延或放弃，将不断增加困境、恐惧的负面影响。郑开文性格特征习惯于在严格而缜密的逻辑思维引导下马上开始行动，他径直来到溜筒江边等待渡江作战的前线驻地，再三强调：攻击盐井、毕土的命令是强制性的，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必须坚持不断、残酷无情地向前推进，哪怕是粮草消耗完，忍饥挨饿，也要克复盐井、毕土。

初具军事常识的人都可能在地图上画出一个进攻战略要地的箭头，问题是谁来实现这些箭头所表示的战略意图，“说一尺不如行一寸”，只有行动才能缩短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只有行动才能把意图、想法变成现实。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经过长途急行军，克服了平时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硬是用溜索运送武器弹药马匹辎重，官佐则全部攀援横江绳索泅渡水流湍急的澜沧江，乘势分兵围攻盐井、毕土，血战数昼夜，于8月26日深夜克复盐井县城，俘获大喇嘛等千余名叛匪，缴获枪械弹药无数。左纵队则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翻越梅里雪山北坡，兵临察隅、毕土，拓地数千公里。西征滇军左右纵队沿梅里雪山、澜沧江的东西两侧，相互联络，分兵进击，在数月内即达成滇省都督府进击西藏，并截断围攻川边的叛军后退之路的战略意图。

特点七，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要求学校教官“身先士卒，严于律己”。郑开文曾有文章归纳了军

事教育的精髓所在：军队教育极其精深，要在为官长者能身先士卒，治己治人，举凡一切学术、精神、言行动作等等，皆以身教为上，言教次之。^[15]这个“身先士卒，治己治人”“身教为上，言教次之”的要求体现在教学过程中：

1. 要求教官对所讲授的课程必须要研究透彻，是自己潜心研究的成果，认真备课，不能随意发挥，无的放矢。章程第五十三条：订定学术均关重要，务使全部研究，确的心得，无任其性之所近，以致挂一漏万。

2. 要求教官对课程教学制定教学计划，经业务科长、校长批准后颁发，课程教学必须按拟定的教学计划进行。章程第五十四条：学术进度刊表颁发，务确遵实行无视为具文。

3. 杜绝教官没有认真研究，照本宣科，玩忽职守，从而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章程第五十五条：照本宣读，毫无研究，足灰学生之心，且阻上进之心，务须认真讲解，俾其毫无疑意。

4. 要求教官们重视研究教学方法，因材施教。章程第五十六条：学生资质智愚不一，务须循循善诱，合谕陶冶。

5. 要求教官在日常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和爱国热忱，并作为成材的考核标准。章程第五十七条：尚武精神、爱国热心，务力加提倡，用备干城之选。

6. 要求教官制定教学课程时必须契合军队实际需要，强调军校必须重视军事、学术的实际运用，而不是空谈理论和政治。章程第五十二条：军事学术首重实行，务确定教育方针本此实行。

与前任校长们相比，郑开文似乎有点与众不同，那就是在总的目标下，注重对军事文化的源头进行反思，重视军事教育的经世济用，更关注落实这些军事教育目标的途径、方法。俗话说“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所有规章制度的关键在于落实、执行，关键还是在人。郑开文对军事教育的宏观把握和细微之处的严格执行异于常人；对承担的事情认真负责和勤奋踏实的特点，使这个章程的每一条款都得以认真落实到位。或许就是这一点，最终让郑开文比同时代的许多军事教育者走得更远。

如果对郑开文民国初期的军事教育理念、方法作一些探讨，就会发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规章制度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郑开文曾于1914年春，参与唐继尧等人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举办的“将校讲习会”。据庾恩旸《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九章载：唐继尧“设将校讲习会，凡旅团营长官，皆令人会。”之所以创设讲学会，唐继尧在《云陆军将校讲学会弁言》中说：“是因为社会上道德堕落而影响了军人的品性，使军人赌博酗酒，狎妓行乐；自暴自弃，志昏气惰；散漫成性，闻令不行。”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讲学会会员集中听取演讲三天。演讲分学科为三：曰《道德要旨》，曰《名将事略》，曰《法治大意》。并明确指出三个学科各自的讲演目的：讲道德要旨是为了陶冶军人的性情；讲名将事略是为了提高军人的品德；讲法制大意是为了规范军人的身心。除教授以上三科外，“又印刷理学各书，分授各将校自习。并于每星期召集各将校亲授以《王学旨要》暨孙吴兵法及军事各学。且集合军官时，辄训以中国内忧外患，祸至无日，闻者无不奋发。”

《法治大意》主讲人王灿先生说，其讲演之目的“在砥砺士气，灌输民主思想。”说法虽有不同，内含则完全一致，即提倡用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军人道德、精神、规范来提高云南军队的战斗力。有些讲演者强调用“仁、义、礼、智、信、恕、勇、敬”八德来提高军人道德水平，并有针

对性地提出了以正本、慎独、立志、明分为拯救道德堕落的方法。^[16]显而易见，这样的演讲略显空泛、繁琐，虽标榜“其讲演之目的在砥砺士气，灌输民主思想”，但就其讲稿内容而言，显得对民主共和思想缺乏深刻的理解，修身养性的教化有之，缓不济急的纯学术研究的意味浓厚，孔孟文化的教诲多些，而于兵事教育则针对性不强，也无法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情形下实现其教化。

相比较而言，郑开文作为“曾经大地河山从新整顿”的亲历者，并亲手参与创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家的中央官员，对民主共和思想的认识自然比常人要开阔、深刻些。在制定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育方针时，注重筛选、汲取传统文化中军人文化的合理内核，又突出辛亥革命打破孔孟之道的教育传统，注入民主共和的思想理念。如提倡军人教育“以全身之精神振作军队，巩固国家，应以武勇信义，礼仪，军纪为主”，这个军事教育宗旨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改革。军人的责任就是巩固（保卫）国家，即是爱国。面临战争或国家利益需要时，军人以国家的安危为己任，以救济乱世而增进国人的幸福为责任，可以归纳为传统文化的“武勇信义”。提倡尚武精神（素质）的培养，是军队的职业特点所决定的。勇即《论语》“勇者不惧”之意，当国家有事发出号令，军人当为国家利益、名誉而征战，乃有不畏强暴，奋力抵抗的精神（品质）；军人需要大勇，能柔能刚，能弱能强；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非徒以喑鸣叱咤临驾一切为能者也。“信”与信仰、忠诚、诚信相联，军队练兵打仗必以忠诚国家为信仰；军官统率兵卒时，必以诚信相孚，才能收臂指之效。义，正义也，军人以救济乱世而增进国人、民族的幸福为正义。这些理念可以概括为“保境安民、富国强兵、抵御外辱、卫我国权、扬威中华”的军人道德、道义。

郑开文主持制定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突破了当时云南政学界对军事教育的片面认识和因循守旧的氛围，注入了代表民主共和思想的军事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和可操作性，所表述的军事教育理念则完全摒弃了日本军事教育的上下级奴隶般服从的“军人精神”，废除了狂热宣传为复仇，为侵略他国领土，为升官发财而打仗的“尚武精神”“盲目服从”，创立以“国家、责任、荣誉”的大格局培养军人精神，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极具创意和开拓性，引领了民国初期军事教育的发展方向。

第四节 军事教育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绝妙办法

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的讲武学校内部期刊杂志，大多是郑开文任期内编辑发行的。这些学校组织、支持的各年级日记、作训、学习体会、诗词等期刊的编辑刊印，对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有很大帮助。如：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三期编辑发行的《日记》；军官候补生《入伍记》上、下册。剑余诗社出版发行《剑余诗集》，出过多集，时间长达5年之久，叶剑英元帅曾是诗社的编辑和撰稿人之一。教学、科研文章《最新步哨斥候实地教育法》等。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有郑开文将武校师生的各类文章引向社会，在云南《义声报》上动用大量篇幅登载讲武学校师生的国文成绩、教育成绩、学术成绩及学术试验（学术评比）的考卷及评语，宣传学校的办学成果和学术水平。

以往社会报纸上虽有零星登载学生优秀文章的先例，但是成规模、大量登载武校学生的文章，

进行舆论宣传，则是郑开文校长首开其例的（也随着他的离职而销声匿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此时期该报残缺较多，而其他同时期报纸均无此类文章登载），从1916年11月4日至1919年5月，发表在云南《义声报》国文成绩专栏、教育专栏、学术成绩专栏上，由讲武学校学生撰写文章达36篇，内容涉及广泛，题材多样；有军事、文学、时政、评论、游记等。如：讲武学校第十二期一班学生陈宅揆《论军国民教育之利益》；第十三期第一班学生李秉仁《论文学与军事之关系》；讲武学校第一队第一班学生王泽广《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十三期第一班学生梁德奎《用兵之要在乎一民论》；第十一期学生潘全德《金殿旅行记》；第十一期学生杨文彦《愿诸君勿忘五月七日之耻说》等等。这些文章一经刊登传播，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兴趣，有识之士纷纷称赞，提高了讲武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也大大提升了讲武学校学生的荣誉感和自信心，成为社会精英的预期目标得到强化。

1917年5月10日，《义声报》刊登讲武学校第十二期一班学生谢毓麟的国文成绩：《军国民教育与军事教育之区别》一文，其中谈到：

……盖军国民教育其目的在文学校增授军事，使人人知军事之大要，而对于操法及刺射两术犹须加意力学，精益求精，将来成材，可平内乱，可御外侮。若军事教育则其目的专于军事整顿海陆军，多造将校，以备他日教育兵卒，改良军人之通弊，振刷军人之精神，此区别之大略也。然则军国民教育与军事教育二者，皆以图目前自强之计，关系国家存亡者甚大，是故无军国民教育无军事教育之。国家断不能生存于今世，此自然之理也。试观欧洲各国，国富兵强，称雄世界，为我国所不及。何哉，诚以其有军事教育与军国民教育也。昔日日俄之战，日胜而俄败；中日之战，日胜而中败，皆日本之军国民教育与军事教育精良所致也。向使以我堂堂中国能奋毅然之气，存爱国之心，举四万万之众，同心戮力，以实行军国民教育与军事教育，则复我国权，湔我国耻，指顾可期，我灿烂之河山、庄严之境土，神明之胄裔，外人何敢覬觐。

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第一班学生师楷关于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章挺有意思，题目颇长，《闻近日联军与德构衅波及我国，而一般贤士大夫有请仍守中立者，有请与德断绝邦交者，甚有加入联军与德实行战争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究宜如何应付始足以奠邦交而惟国本，试放言之》：

……联军与德构衅于今三载。此数年中，实我国图强之一大好机会也。乃欧战发生以来，不闻上下一心、全国一致以为自强之计，而惟权利是争，倾轧是尚，各分党见，互分畛域。欲望无厌、希冀非分之徒且利此时机扩张权势，发展野心，以求其永远不拔之基业。辗转迄于今日，战祸波及，始遑遑为临渴掘井之谋，而漫然从事于议论，无怪乎纷纭扰攘，莫衷一是也。为今日中国计，苟欲为埃及、波兰之续，则亦已矣。若尚思挽狂澜于既倒，作砥柱于中流，以期奠邦交而惟国本，则应付之道：对于德国，固不可不与断绝邦交以保我中立之权。对于联军则无妨虚与委蛇，以免受其胁迫。而一面卧薪尝胆、闻鸡起舞，极力讲求内治，整顿军备，以为我之不可胜而待人之胜，庶足以图存于万一也。

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第一班学生杨杲《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说》的文章从另一个侧面谈到军队将领的表率作用：

……故文武治军于德，全军皆德，不犯秋毫；秦楚治军以暴，全军皆暴，祸国殃民。细柳之将严，则全军俱严，坝上之将怠则全军俱怠。晋文公伐原示信三军，乐从楚子玉。练军刑侮，三军皆怨。此平日之将治，三军与之俱治，将乱，三军与之俱乱。若临阵杀敌亦莫不云。然三略云：将无勇则谋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楚王好战，士卒奋战，李陵振臂一呼，创病皆起。赵将一退，士卒奔命，难以复壁。朱生一呼，秦军败北。呜呼，

将者人之司命也，士卒之中坚也，三军之柱石也，能不以身正人乎。

其同学杨振陆在同样题目的文章中论道：

……故欲部下咸守军纪必先以军纪自绳，一人之身，千万人之身也；一人振拔，三军效命；一人萎靡，三军偷安；一人义则亿众义；一人仁，则亿兆仁；一人贪戾，三军暴乱。故曰：将者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

讲武学校第十期第二队第一班学生赵人绪的考试作文《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说》云：

秦举十万之众，动向击晋，晋人深沟高垒以恃之，秦师遂不能久持；楚人部曲行伍刁斗戒严，吴师至而立收军，是故晋不恃秦之不来，恃恃其有以待之；楚不恃吴之攻，恃恃其有所不可攻也。古之善用兵者，屈人之师在我而不在彼也。拔人之城恃而已而不恃人也。先为不可胜以恃敌之可胜，使可胜者而终不获，逞其可胜可败者而终不致败者也。以楚庄王之智，犹以日日以祸至，无日为尤；以越勾践之雄，尚时时以卧薪尝胆自勖。然则，智不及庄王，雄不若勾践者，将何以目处乎，故善用兵者，以虞待不虞；以有备待无备；以逸待劳；以壮待老；以近待速；以实待虚；以强待弱。常言亡而终不可亡，常言危而终不可危者也。且夫恃敌不来敌必常来，恃敌不攻而终至，鱼烂而亡焉耳。是故，直以议陋而溃，齐以狎敌而忧，号以易晋而亡，鲁以卑邾而败。史笔昭昭，宁有幸耶。孙子曰：用兵之法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诚知言哉。

此文从敌我两军对垒抗争的角度，阐述军事战术、军人心理学的用兵之法，不无见地。文章逻辑清晰，论证详密，出于学生之手，真让人刮目相看。郑开文校长颇有觅得千里马之感，十分欣赏。据家族长辈人回忆，郑开文喜得良才，一高兴就将女儿许配于赵学生，成就一段惜才爱才的佳话。

特别值得一提，武校学生有两篇参加“云南省学术批评处”历次试验（竞赛评比）的文章，以军事学术论文的形式获得省级学术论文评比第一、二名，这在民国初期的中国是个了不起的成绩。笔者对军事学术理论一窍不通，对讲武学校学生的军事学术水平如何，诚不知道深浅，不敢妄言。试录两篇，请读者自己评判一下，也可以顺便了解郑开文当年花费不少心血、着力进行的怪异举动有无值当。

讲武学校第十二期第一班学生陈开干参赛的论文题目：《兵权不集中不可以为健全之国家；政权不集中不可以策一致之进步；且无以抑制特殊之势力而张公理、正义之权，然二权之集中皆为民主国民所最嫉，然则将何法之从》，曰：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一期学生李洵的作文本及部分作文题目（李正平提供）

人生无欲望乎，无欲望则种类灭，世界歇。人生有欲望乎，有欲望则攘夺生，大乱起。然则将何法之从。曰别于公私而已，孜孜以求，终岁勤勤。有今日思来日；有一身思后裔。由利己心而生爱他心，熙熙攘攘，以演成黄金世界者，公之欲望也。贪邪淫恶非分而于不义而取大盗移国，奸权问鼎，演成古今惨痛。历史者私之欲望也，是故公之欲望不兴，不能成富强之国家，私之欲望不绝，断无善良之政治。不富强尚可勉，而几无善治则不可以为国。今夫积人民而有家族；积家族而有郡落，积郡落而有国土，积国土而成大一统，此国家演进之阶级也。夫所谓大一统者；必其兵权、政权统一中央。中央权力巩固不摇，而后可以收指臂相使之譬如之一身，头脑健全，全体四肢始得康宁。自古无不集权之国家观。于汉唐宋明清一统专制之效可睹矣；德意志名虽联邦，其实皆能团结一致，兵权、政权皆能总一，故有今日之强盛。关利坚虽分四十五州，自国家权力集中论发明以来，今日犹正向前进行。可知世界之上无论君主、民主，其国家权力未有不集中者也。其不以集中为然者，皆无政府野心家之作用，吾乌知其所云。然哉，呜呼，由数千年君主独裁一变而为民主共和，此实吾国历史上之一大进步也。顾何以立国五载，毫无要领，民德日薄，风俗日偷，盗匪遍野，民不聊生。武人、政客布满坑谷，争权夺利纷扰不已，名为共和，实系共乱，以视前清反形退化。近者民选省长、联邦制度之声浪腾于耳鼓，主张极端之地方分权主义者，务削中央权力，举其兵权政权一一而分割之。以为不如是即非共和之正轨，殊不知此与国家演进之公例大相反背。无如一党提呼，庸流附和，割据之形势已成，来日之大难未已，长夜漫漫何时达，且症危至此，纵使虚扁复生，亦将无从下手矣。虽然乡邻有口冠缨往救，孺子入井惻隐皆生，坐视宗国之危，一援手者，非人也。思以一得，献当世者，吾党之责也。天下患在私欲，私欲之目的在权利之所在。强者捷足而先登，联翩而后进。此数千年来纷扰之现象，皆此权利阶之厉也。今欲筹一挽救之方，造成完全之国家而收统一集中之效，窃以为一方面宜减轻人民之负担；一方面宜设立义务之政府。今人民妒嫉政府无信仰之心者，则以社会之生计枯竭，负担过重，巧取豪夺随在。皆是不能为丝毫生利之事而剥之削之，以为政府之恶耳。今之务削中央权力而欲

为联邦者，则以权利所在，而为自由之行动耳。但能减轻负担，则人人发展，其本富而万汇有昭苏之象，元首之戴如帝天矣。倘能义务政府，则奸邪忘其凭藉，小人无容身之地，君子有进身之阶矣。义务政府立则法律之尊严，以起政权不患不集中；义务政府立则向之拥兵以逞者必纷纷解体，兵权不患不集中，减负担。所以，行义务口云者，最善良之政治救时要义，诚在此，不特此也。义务政府实行则前之为私欲望所束缚者，必将一变其趋向，而有公欲望以四百余兆之群众，趋于公欲望，区区富强之效难立见，且由此而开世界太平运，又何兵权、政权集中之足云，世之谋国者，日日言集权而究知其所以集，皆未得根本之解也。^[17]

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学生全文达与上文同样题目的文章获云南省学术批评处第二次试验甲等第二名，他写道：

概自海禁大开，欧化输入，举国上下受外患之刺激，痛内政之腐败，一般国民改良政治，力图富强之声风起云涌，如雷轰电掣，如潮如沸，不可制止。然而专制倒共和建，总统废约法，立五年于兹，进步毫无而退化日甚。论者辄谓法、美之制（度）不适于中国，于是联邦议起，民选途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中央政府徒拥天王之虚号，而悍将骄卒，跋扈专横；党人政客攻揭捣乱。公理正义扫地无存。服从拥护之具文仅为公牍上之名词，不能见诸实事。国事如此，堪为浩叹，间尝追源溯流，政局所以呈如此败象者，皆一般国民自私自利之毒流日浸月渍，以酿成此败国亡家之现象。……

两篇获奖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民国成立五年来的种种政治腐败、政权分割、武人割据等现象，试图从树立为国大利克私利、成立义务政府（廉洁政府），减轻国民税负，发展商业、实业等实际出发，提倡摒弃联邦自治、民选省长等不切实际的幻想。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方法不无见地，从侧面表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师生是非常关注国家政治、军事、时事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清晰讲武学校培养的人才所承担的责任，“若军事教育则其目的专于军事整顿海陆军，多造将校，以备他日教育兵卒，改良军人之通弊，振刷军人之精神，此区别之大略也”。这与他们平时受到校长、校外“精神讲话”者、专业课教官的讲课、报告和阅读大量课外书籍是分不开的，亦表明讲武学校从各个方面为学员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这种培养学生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争取荣誉的方法，不是去创造一个神话，只是证明人的意志、抱负、精神、理想是个人、团体事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激发学生心中燃烧的要在未来承担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其教育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先让学生去感悟、去思考，然后得到知识。由于开始时知识都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得到感悟和兴趣，知识就容易变成能力、智慧。说到底，智慧其实就是经久不息的创造力和追求成功的持久动力。

第五节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精神讲话”的是是非非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明文规定，“精神讲话”为讲武学校正常军事、学术教育的补助教育。章程第五十八条：精神讲话最有裨益，或另定时间或即于学术问题随时演讲。第五十九条：教育材料应求完备，应分科统筹，请求补充。这两条规定，对“精神讲话”的实施和对演讲者的演讲内容提出具体要求。郑开文着着推行建设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竭力倡导军人精神的培育，得

到云南督军唐继尧和士绅的欢迎和支持。郑校长在开学、学员毕业和其他重要时刻通常邀请唐继尧及绅商、学界著名人士到校参加典礼，作演讲、“精神讲话”、主题授课、对话及交流。如省城学界泰斗袁嘉谷、吴琨、席聘臣、孙志曾、周钟岳等人从各层面演讲传统军人文化和国学知识、法律常识，使学生倍感兴奋，也获得许多新知识。在讲武学校学生的作业、考试文章中屡屡出现：《出师表》之忠义之心；《岳飞传》之慷慨激昂；《哀江南》之亡国悲痛；“不破楼兰终不还”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表达。由此可见这些“精神讲话”的内容广泛，见解深刻，颇为学生所接受。

作为滇省都督，唐继尧“精神讲话”的次数自然较多，由于各种原因，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却非常少，讲稿遗存难见踪影，也因此对唐的“精神讲话”屡有诟病。如刊载于《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的文章，以亲历者的口吻，讲述了当年唐继尧“精神讲话”的内容和现场情况，照录如次：

……唐继尧标榜自己是王阳明的信徒，并以“阳明学说”作为精神讲话（内容），多次到讲武堂进行宣讲。一次，唐继尧到讲武堂讲话，再次讲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声称“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并问学员：阳明先生的学问深如瀚海，敝人略说一二，不知诸君领会没有？如有不明者，可以发问。叶剑英遂站起来质疑道：“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否一致，有何异同之点？”……唐继尧面对质疑无言以对，支支吾吾，敷衍几句就下台去了。[18]

是否真有其事？孙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出自孙中山著《建国方略》第一篇《孙文学说》（心理建设）。1918年5月，孙中山在广东首次护法运动失败后，愤然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回到上海。1918年8月26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入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至1919年5月一年多时间里，孙先生深居简出，闭门读书，苦心研究，认真回顾了自己三十多年的革命历史，终于著成《孙文学说》。《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国家学说、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代表作，全书共分8章，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他以大量事例为依据，首次提出“知难行易”的理论观点，明确了“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

1919年5月20日，《孙文学说》第一卷《知难行易》付印，6月5日由上海强华书局发行。这个时间点很重要，鉴于当时云南属边远省份，士民贫穷、交通梗阻、邮电信息非常落后的实际情况，由上海发行的《孙文学说》一书很快到达武校师生手中的可能性很小。有记录表明金汉鼎先生可能是云南第一个获赠此书之人，时间是1919年10月1日，由孙中山亲自从上海寄出。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展示的叶剑英《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证》签发时间是1919年12月22日、现存叶剑英获得陆军炮兵少尉的任命书签发时间是1920年1月30日。按武校学制的规定，学员在武校完成学业后须到基层部队实习3~6个月，才能正式毕业并获得军官任命。也就是说，学员进入基层部队实习时间是从暑假后（9月）开始，身在部队紧张实习的武校学生是很难获得此类新书籍的。

再则，孙中山先生载有“知难行易”内容一书在1919年5月初发表后，唐继尧有没有与武校第十二期学员进行过“精神讲话”，疑点颇多。原因至少有下列：1919年7月17日，唐继尧致电广东韶关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电文，有“继尧不德，数月之间迭遭大故，昊天罔极，五内

摧崩”之语，说明此段时间其心情很不好，甚至不能正常办公。送往迎来、庆典演说的活动肯定是不能安排了，亦有请长假料理丧事的假条在报刊上登载。

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是否一致，有何异同之点”的质问，是否可以引申为学生服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反对唐继尧“知行合一”说？以现代管理学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学说是为解决护法运动中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理论问题，主要是针对处于决策层面的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事业的模糊认识，其根源在于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想方式的束缚。孙中山先生提出“行其所不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后乃能知之”的论断，是解决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后，对孙中山制定的革命路线方针、建设事业的方向“信仰不笃，奉行不力”的问题。唐继尧、郑开文推行“军事教育、精神教育”的对象是准初级军官，是具体的执行层面、操作层面，理论水平的要求与决策层面肯定是不一样的，必然是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的循环提升过程，即“知行合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意思。对于武校师生如何学习军事知识，文化知识和培养军人精神方面，引导学生采取“知行合一，学思合一，学做合一”“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等，这对于立志成为合格军官的年轻学生来说，很有裨益。郑开文校长最忌惮用培养政治家、官员或学术精英的方法来培养初级军官，凡事都讲求“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教育作风”是培养不出合格军官的。

军人承担的责任与其他职业人群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武校必须重视军事、学术的实际运用，而不是空谈理论和政治，所培养的军官应该把“御外敌，平内乱”的国家责任担当在肩，练好过硬的军事本领，随时听从国家召唤，不惜用鲜血、生命去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平时所有的军事教育、精神教育都应围绕提高“战斗力”而进行；军队就是需要在思想、军事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精神、体能等诸方面时时刻刻准备打仗，打胜仗。平时练就克敌制胜的强硬本领和与之相匹配的精神、体质素质，遇到战事才能以铁血相争而以战止战，凭恃强大军队而屈人之兵，捍卫祖国、世界的和平安宁。

笔者现居家部队干休所，抬头就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军队的指示：“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时刻都能感受到“部队的一切工作重点就是围绕着如何打胜仗”的氛围。即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军校教育必须着眼于信息化战争时代的挑战，重塑军校办学理念，培养具有实战能力和现代化实战水平的人才，锻造驾驭高技术战争的精兵良将，已成为中国军队顺应新军事变革之必需。部队官兵的一切工作重点都须放在如何打胜仗上来，“兵不可无一日不练，战不可无一日不备”，战略战术要常常演练、规划，上天入地的武器装备要精良娴熟。平战结合，练为战，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加强训练，平时严格训练，培养铁的纪律。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是强军经武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至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一文所说的情况：

教育方式全采用法西斯式的奴才教育，黑暗专制、绝对服从是首要的教条。简单粗暴，以罚代教，是经常使用的教学方法，没有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教育作风。除研读军事课本以外，不许阅读其他课外书籍和报刊，政治书籍是绝对禁止阅读的。在校无异处于世外，思想上陷于极度的苦闷。（随后又行文说）武校当局对文体活动，是没有组织的，对华侨同学赋性活泼和爱好文体

活动的习惯，是不适应的。我们只好自行组织足球队、排球队、乒乓球队和假日旅行队等活动。球队常与昆明各校队作友谊比赛，交流经验。爱好文艺的同学则组织诗社，借以互相研究切磋。当时云南《军事杂志》常刊登同学们的作品，其中不少质量好的，受到社会人士的欢迎。

显然，此文作者前后矛盾的叙述，对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教育方针的评价缺乏事实依据，亦有脱离云南经济、文化落后现状的不切实际要求。对清末时期可以（也必须）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内开展鼓吹颠覆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与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后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内培养合格军官的历史阶段区别不清，认识模糊，恐怕有“口述历史”之嫌。至若“教育方式全采用法西斯式的奴才教育，黑暗专制、绝对服从是首要的教条”之语则需要分辨良莠、程度轻重等因素，至少“绝对服从”的教育就不是教条而是军人之必须。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华侨学生是否参加政治活动？答案是肯定的。云南省档案馆就有一份“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致南洋华侨同胞书暨致书地点名册”的馆藏档案，此档案表明在武校就读的南洋华侨学生不仅个人慕名回国学武、投身于革命洪流，报效祖国，还根据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和云南省情，投书国外侨居地宣传国内革命活动，动员华商、父老乡亲捐助资金以支持护法运动。据档案史料记载，此份致南洋华侨同胞书的成书时间是1917年9月，保存在一位名为符汉的学生转呈给云南省都督唐继尧的一封公函里。这封武校华侨学生致南洋同胞书，叙述了华侨青年“负笈滇池，师从武校”的感激之情；称赞云南讲武学校无论是校长郑开文还是教官均系“武学泰斗，教法美备”，让他们对学业、对未来充满信心，“将来毕业当必小有成就，藉可为国宣力”。尤其是在向南洋侨胞讲述捐资云南，助力护法运动的重要性、必要性时，文中提到“且目下民国骨干全在西南，西南骨干滇居其半，为滇即为西南，为西南即为全国，非有二道也”，充分强调了当时云南的地位、作用。而捐资为“庶共和之民国，永挺峙于地球，违法之内阁可消灭于俄顷，而我侨商之光荣，亦即争辉于世界矣”的意义则最为正大深远，深深打动每一个炎黄子孙、海外华侨的民族情怀。亦可见，当时云南虽处边陲，却聚集了各类人才于全国之首，如此高的评价，不仅是华侨学生的认识，更是全国对云南的共识。

最让人为之动容的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叶剑英，出现在60名华侨学生的签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叶剑英签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致南洋华侨同胞书暨致书地点名册”，凸显了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侨学生为复兴中华的担当意识，报国之志和爱国之情。而且，这封信函成文时间是护法运动风起云涌的1917年9月，华侨学生身在军校，心系祖国、胸怀天下，呼吁侨居地人民“互相勉励，慨助饷需”，积极践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情怀。今日捧读，依然感人至深，弥足珍贵。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致南洋同胞书》内容如下：

南洋华侨同胞诸公伟鉴：

远睽芝晖，时殷葭溯，辰下菊黄枫紫，雁到霜清，敬维履祉吉羊，鼎祺安燕。

僑云引领，祝露倾心，负笈滇池，从师武校。校长郑中将炳然暨管教诸公均系武学泰斗，教法美备，而滇中政府又相待优异，将来毕业当必小有成就，藉可为国宣力。兼之气候和煦，风物文明，饮食卫生诸多便利，乞释远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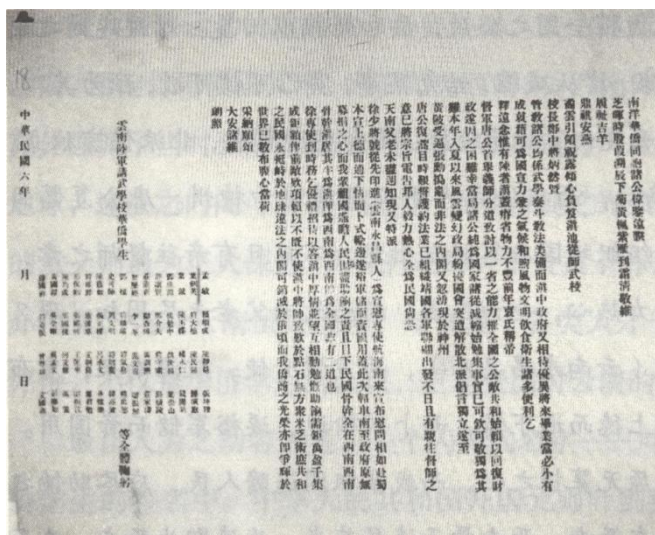
惟有陈者：滇盖瘠省，物力不丰。前年袁氏称帝，督军唐公首举义师，分道致讨，以一省之能力摧全国之公敌，共和始赖以回复。财政遂因之困难，幸当局诸公纯为国家，诸从减缩，始免集事，实已可钦可敬，独为其难。

本年入夏以来，风云变幻，政局纷扰，国会突遭解散，北派倡言独立，遂至黄陂受逼，张勋捣乱，而非法之内阁又忽涌现于神州。唐公复蒿目时艰，誓护约法，业已组织靖国各军联翩出发，不日且有亲往督师之意，已将宗旨电告邦人，毅力热心，全为民国。尚恐天南父老未尽周知，现又特派徐少将号从先印进（云南永昌县人），为宣慰专使，航海南来，宣布慰问。相如赴蜀，本宣上德而通下情，而卜式输边，遂裕军储而资国用。盖此次轺车南至，政府原无募捐之心，而我辈祖国遥瞻人民，应尽助饷之责。且目下民国骨干全在西南，西南骨干滇居其半，为滇即为西南，为西南即为全国，非有二道也。徐专使到时，务乞优礼招待，以答滇中厚情，并望互相勉励，慨助饷需。钜万盈千，集成钜额，俾前敌款项赖以不匮，不使滇中将帅致叹于点石无方、聚米乏术。庶共和之民国，永挺峙于地球，违法之内阁可消灭于俄顷。而我侨商之光荣，亦即争辉于世界矣。敬布腹心，当荷采纳。顺颂大安，诸维朗照。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孟敏、叶剑英、赖顺成、陈静庵、张坤理、符大植、陈民钟、钟演庭、叶钺、陈玉楼、杨永仁、钱开新、邓祺渊、侯勉中、洪世扬、叶崇山、许让贤、郑介夫、詹守素、严续陵、庄鼎新、欧杏传、冯训济、庄家梁、龙历经、李一峰、范文喜、梁振淮、邓炽、符麟瑞、符气巢、詹忠恕、史可思、周文明、符昭骞、韩亮兼、陈真如、张正权、吕承文、华惟能、符维群、卢汉章、文朝籍、肖君勉、邢保卿、冯裕饶、王连华、梁正经、陈均成、邢国栋、何文耀、冯翼、黄国梁、吴金刚、吴孟文、彭德如、钟国祥、符克振、曾粤珍、文国燕。等。

全体鞠躬！

中国华民国六年



《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华侨学生为护法运动下海外华侨募捐饷信》（档案影印件由张文芝提供）

百年前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精神讲话”究竟怎样？笔者近期发现一则唐继尧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可一睹唐继尧“精神讲话”真实面目。原封不动地将其全文录下，避免断章取义之嫌，一起来看看百年前的“精神讲话”，与回忆者的往事叙述有何不同，

水平如何？

云南《义声报》1920年10月27日，第五页，载有《义声报》编辑部文章《讲武学校毕业志盛》：唐联帅剴切之演讲，叶军长豪爽之陈词。

云南讲武学校自开办以来，曾毕业学生至十二期，本年十月十八号又为第十三期全体暨十四期由川送来之学员一部分，举行毕业礼式之日。是日，午前十时，唐联帅及军政绅商学各界要人齐至。先行校阅礼，则见各毕业学生操作俱甚熟练，整齐可观。次发毕业之司书，其中最优秀等三名，均有特别奖励。发证书毕，首由联帅演说：

（唐继尧）略谓：诸生今日毕业后，责任至大，其所以希望诸生者亦至殷。改革以来，瞬将九载，连年用兵大动，为集民困益甚论者，几以用兵为不祥之物。诂知，用兵亦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果为正义也，则兵何能不用。然以云南言之，历年兵事多在川中，种种诬谤遂因而起。第一次援川，时当辛亥反正，赵尔丰未灭，尹昌衡未出，川事纠纷，民不堪命。云南出兵救灾恤邻，光复旧物，理之宜也。而二三奸人。唯恐富贵自私之计不得保，遂创所谓侵略之言，殖民之词。而滇军反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矣。洎乎丙辰袁氏称帝，曹、张入川，民国之命不绝如缕。护国一役，为国民争人格，为共和争存亡，转战川中，又岂得已。而川中一部分奸人又往往以似是而非之言来相诋排。至于护法兴师，原以段氏专权、总统被逐、议会解散、大法凌夷、国纪荡然，义难坐视，以有此举。而刘、熊反迎吴光新来渝，不合滇黔兵以护法，反召段系兵以坏法。昔日同志，今日仇雠；昔以义始，今以利终。熊、刘祸川，转诬滇黔，诚莫解已。今次战争更为熊、刘作俑，军府护法不终，欲求卖法苟和，乃改编驻粤滇军，以济其私。熊克武和之障碍，川中出兵，于是而同盟军共起逐熊。今熊日勾结附北，毁法之。刘存厚煽动全川军队假籍川人自决之名词，拼命与护法义师血战矣。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滇黔不负国家，熊刘实负滇黔，使因此。而遂苟且罢兵，置国事于不问，则今后我民国景象其将于胡底。总之，云南连年用兵纯为国家，毫无私图。熊、刘种种诬排之词，久之自见，不攻而破。而吾人所以为国家者，尤非始终坚持，最合正义之用兵不可。惟今有两种浮言足以摇惑观听，隳我士气者；一曰民治潮流，一曰罢兵息民。夫民治主义吾人屡有宣言，何尝不极端主张，顾今日耳食者流动，称既讲民治何必用兵，岂知兵以卫民，民害不除，遑言民治。今之卖国毁法之政府，非所谓民害者耶。此而不除，吾人言治之，彼而实卖之，治于何用。有俄国过激政府可谓民治矣，而不能无红卫军；威尔逊世界和平十四信条可谓民治矣，而美国反增海陆军，可知实行民治不能废用兵而用兵，仅有时而促进民治也。此宜了解者一。民国成立九年于兹，兵革不息，民实苦之，苟有机会罢兵息民，通商惠工、兴学，劝农民，殷国富，诂不甚誉。无如大法未除，权奸犹在，环顾国中争权夺利之流，图利分赃之辈，滔滔皆是，谁与易之。使此时不能罢兵而遽罢兵不能息民，而遽息民，吾恐偷一日之安贻百年之危，来日大难有甚于今。惰性一生，全盘俱坏，一篑功亏，九仞不成。欲求罢而愈不能罢；欲求息而愈不能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一日纵敌数世之患，此宜了解者二。二义既明，则用兵之说可不待烦言而解。惟用兵则整军之道不可不讲，整军之道千头万绪，从何做起，然大要不外古人所谓“明耻教战”四字，俗话说“人无廉耻，何事不可为”，今请易之曰：“军人无廉耻则教战不可能”。故耻之为用极大耻，置不可不明。如西南护法即明法之重要，而以坏法为可耻也。西南护国即明共和国体之不可擅更，而以牵制为耻也。既明之，既耻之，则身为军人必以此而战，战无

不胜；以此而教，教无不从矣。故曰：知耻近乎勇，勇者不惧。云南虽处边隅，昔在历史上、地理上于国家权法地位其关系，自入民国护国护法，一再举义，担有名誉，今若一日罢兵，半途而废，名堕末路，耻何加焉，此应注意者一。云南地瘠民贫，屡次用兵，元气锐减，今若遏让，自甘偷安一室，一旦敌兵压境，蹂躏桑梓，护国护法至不能自护其乡，耻孰甚焉，此应注意者二。学生今后毕业身入军营，即为军营中最要之下级干部，与士兵接触较多，苟以此为明，以此为耻，以此为战为教，则护法、救国最后之良果，将于诸生收之，诸生勉旃。

抑今日之十四期学生本未届毕业期，惟川中前送来学生数十名，屡请早日回川效力，故特提前毕业。诸生此去，尚望予意传达川父老，予非有意穷兵黩武，亦非有意侵略四川，但为国家正义用兵，而四川又为南北必争之地，及熊、刘所梗，是以久苦我川民。今后但稍有正当解决之途，即当有慰我川民也。

称谓问题，是个小事，但也透视出一种平等关系。唐继尧时为滇、黔、川、鄂、甘、闽、赣、豫八省靖国军联帅，可谓位高权重，锋头正健。但对于武校莘莘学子，并无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言语，这在等级森严的民国初期，算是个开明之举。演讲伊始，为师为长为一省都督的唐继尧，把自己与讲武学校师生的关系称之为“吾人”与“诸生”的关系，谦逊得体，颇有“礼贤下士”遗风。从此“精神讲话”可以看出，唐继尧基本上是为云南辛亥革命、护国、护法运动中云南军队三次入川作战辩护，引申云南整军经武的必要性。尤以军事进行与整顿军队的法理关系引用王阳明“明耻教战”一说，为其“如西南护法即明法之重要，而以坏法为可耻也。西南护国即明共和国体之不可擅更，而以牵制为耻也”的立论，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对武校学生的是非观念、思想认识的要求相贴近，有立意深刻，说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特点。

这些演讲、文章，大抵属于领导励志讲话、“心灵鸡汤”的范畴。唐继尧在东陆大学讲话要求师生“阐旧学而培新知，造通才而应世变”，而要求武校师生“如西南护法即明法之重要，而以坏法为可耻也。西南护国即明共和国体之不可擅更，而以牵制为耻也。既明之，既耻之，则身为军人必以此而战，战无不胜；以此而教，教无不从矣”，显然是针对不同群体的职业要求而言，并未出现“唐继尧笃信王阳明学说，凡到校讲话，大谈其良知，良能，知行合一等滥调”的状况。

唐继尧的“精神讲话”被他人作不同解读，负面评论居多，《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中百余字“质疑督军”的故事则流传甚广，起到了脸谱化的作用，并由此推导出唐继尧“绝不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和三民主义理论，唐对孙中山先生的态度，从此就可以知其一斑”的结论，实有预设立场、牵强之嫌。

笔者依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1915至1925年的十年间，唐继尧以个人名义致孙中山先生的函电有127件（包括通电），所有函电始终如一地表达唐继尧发自内心的崇敬与敬仰，这种感情是装不出来的，绝非一时敷衍、塞责之语。客观地说，唐继尧是心悦诚服地承认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同盟会的精神领袖，服膺“民主共和”的政治纲领。所执行的护国、护法的方针、策略，亦是孙中山先生倡导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在各个时期、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现实环境下的具体操作。所以，某些学者以唐继尧与孙中山先生之间一时一地的意见相左、行事方法的迥异，导致唾沫星溅起的论争，就断定唐继尧反对孙中山，是否有片面、牵强之虞？

现今的学者对唐继尧自诩“东大陆主人”之语也颇有诟病，认为其有帝王野心。忽略了唐继

尧发此豪言壮语时，正是满清政府衰败堕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之时，正是中国人的思想、意志，身体素质等衰微低下之际。年仅 21 岁的唐继尧此时正值“愤青”年龄，标榜自己要做“东大陆主人”志向，是针对西方列强吞并、瓜分中国，污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而言，有何不妥？

年轻时谁没有远大抱负或谓狂傲之情结。我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诗词曰：“……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昂扬壮志，傲视群雄的情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抒发了诗人以天下、国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似乎正是那个时代精英人物的思想轨迹。唐继尧著《会泽笔记》亦有言：“予年已二十余矣，尚不能率中原子弟振扬国威，可耻者一；才不足以压众，德不足以服人，可耻者二；外患日深，而不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从事振作，好逸恶劳，苟且偷安，可耻者三。此后加倍努力，刻刻自警。”“鸿鹄有志，燕雀何知？今日个人忍辱修学，所以为国家未来立富强之基础也”，若“不速使中国富强，凌驾欧美，俯视列强，枉为二十世纪之中华男儿，生何如死”。^[19]如此雄心大志，能不说，唐继尧“东大陆主人”情结，是为了救国存种乎。

当代人评价唐继尧“好大喜功，野心勃勃，复夜郎自大，极谋扩军经武，逐鹿中原”之说，似乎也有失公允。对于年仅 29 岁就担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来说，看惯了“武人”袁世凯弄权称帝、“泥菩萨”黎元洪傀儡行政，踌躇满志地想成为“东大陆主人”，成就重整河山的“雄图大志”，似乎正是旧时读书人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梦想，正是那个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每个有识之士梦寐以求的理想。纵观唐继尧短暂的一生，处在数千年未有的社会激烈动荡中，历经“重九起义、护国、护法”，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评价，他都是个有血性的汉子，有才气、有抱负，自然也很狂傲，颇具野心。与那个时代所有仁人志士的命运一样，风云际会把他们推上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的社会大变革舞台，亲身尝试了在中国、在滇省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非凡努力。但是，包括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在内的所有政治人物，都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局限，没有可能拥有更为明确的政治理论来指导他们的社会实践，犯错误、受挫折在所难免。甚至于在各种思潮、理论都曾轮替探索和尝试之后，也仍然无以探明前进方向的情况都屡屡发生过。似乎也无需用现时的历史观点、政治标准去衡量评判他们那一代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第六节 郑开文与武校的华侨学生、邻国学生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是中国招收海外华侨学生和国外学生的第一所军校，开启了中国军事院校招收华侨子弟和外籍学生的先河。郑开文校长颇有纳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情结，在初步提高师资力量和改善办学条件后，即着手招收东南亚华侨、周边国家的有志青年进入武校学习，以补充和改变云南陆军讲武堂仅招收云南一地青年的惯例，提高了军校生源的广泛性和质量。郑开文校长首开其端的办校思路，与当时唐继尧扩大南方势力实行整军经武的整套计划不谋而合。唐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一）唐自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后，寅缘时会，独揽滇省军政大权，极谋扩军经武，逐鹿中原，对武校乃作进一步的扩充，培养其军事干部。可惜云南财力薄弱，无从解决，和他的“雄图大志”不相适应。（二）唐继尧很羡慕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深得广大华侨人力财力

的支持，深知华侨富有爱国热情，并有无限潜力。如果能够得到华侨同胞的拥戴，是可以运用华侨力量达成整军经武的愿望。在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期间，华侨同胞为国输将，竭尽全力支持云南的慷慨义举，深得唐的钦佩和感激，思有以报答华侨。同时云南矿藏丰富，惜因缺乏资本和技术力量，如果华侨回滇投资，运用华侨熟练技术，发展工矿事业，开发富源，可增加无可限量的财富，改变云南的贫穷面貌。（三）由于华侨同胞在海外久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丞盼祖国富强，改变被欺侮、被压迫的地位，因唐继尧有护国靖国、拥护共和之功，对唐氏寄予莫大的期望。认为唐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伟大人物”，复经唐继尧一系列对华侨政策的措施，更取得华侨的信任和拥护。基于上述动机，唐继尧乃利用护国讨袁的威望，先后派福建人陈觉民，广东人符赞坊、张杜鹃、曾稚南（马来亚华侨）、叶守誉等为代表，赴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宣慰华侨，对华侨学校社团和有代表性华侨赠送相片和给予参议、顾问等职衔，藉资联络，并招收华侨子弟回滇就学，除主要进入讲武学校学习外，如进入法政学校或其他学校学习，均受欢迎。

邻省、邻国许多有志青年慕名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从武校第十一期至第十八期，朝鲜半岛、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 200 余名，东南亚华侨学生 230 余名。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对学生的招收、考核有非常严格的程序。《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第三十五条规定学生入学考试和身体检验的程序：各处学生到齐即由督署定期考试，其考试科目：学科：国文、修身、历史、地理、三角、几何、代数、物理、化学。检验身体：视力、听力、重量、肺量、身長、下体各部。当然也有例外，如韩国复国运动阵线经孙中山推荐李范奭等三人未经考试直接进入学生队受训。

当时，海外爱国华侨踊跃为讲武学校捐献了大量资金，得以改建和扩建校舍，并引进先进武器装备。学校的规模、建设逐步扩大，教学、教育日趋系统化、正规化，装备、武器相对现代化。在此期间，在校学员就有十个区队，近千人。由于学校实行严格管理，学员每天凌晨 5 点起床训练到每晚 9 点方可入睡，每日三餐后稍事休息即投入“课堂理论，操场演习”的训练，甚至夜间也开展不定时操练。尽管军事训练格外艰苦，由于各级教官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专心教学而无贪污腐化行为，每期学员都自觉刻苦训练，学习及军训成绩优良。更因护国、护法诸战役，讲武堂师生战绩辉煌，前期毕业生中名将辈出，战功辉煌的将级军官大有人在。学校声誉日隆，声名远播，成为首屈一指的国内军事教育院校，可谓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鼎盛期。

华侨学生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当时就有披露。1920 年 10 月 22 日起，云南《义声报》连载《讲武堂华侨学生上南洋侨胞书》一文，作者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毕业的华侨学生杨永仁，兹将其摘录，以供参考：

……现谨将留滇过去之情形并唐联帅之内政摘录奉闻，希垂察焉：一、留滇侨生蒙唐联帅优待之概略情形。当夫袁氏帝制发生，云南首义之际，我爱国侨胞多捐钜资，唐联帅感斯厚意，故有电招侨生往滇留学之举。民国六年，首由代表符君赞坊，陈君觉民亲往各埠招生报名。当时吾侨生有志归国者共七十余人，于民国六年三月齐集新嘉坡，随同二代表由港越入滇，至云南阿迷州，时遇云南督军公署顾问官程君璧（佩）金于旅次，程君立电报唐联帅告以侨生之抵滇，明晚唐联帅即派副官前来车站招呼，且恐侨生人地生疏，故命副官指定旅馆，分配居住。次早派人率领侨生游历名胜，如是旬日。而滇附近之古迹胜景莫不毕览无遗，复招吾侨生宴饮，联帅亲自莅

席，训吾等以治国救民之道，求学立身之本，于道德之修养，志气之磨练，学问之讲求，尤为反复申演更述世界趋势、国家情形以激发侨生爱国热忱，提醒侨生奋斗精神。复与侨生摄影纪念。此未入校以前之情形也。及入校后，因吾侨生中多有未谙国语者，遂区分而与本省学生同住，使语言速得疏通。至于讲授则侨生另设讲堂，选择学问渊深，经验丰富之教官教授，期其迅速成材。又因侨生普通学未有根底，难于领略军事上深微之学问，故特加代数、几何、三角等科，以补侨生不足。而军事书籍则有战术、兵器、筑城、交通、地形五大教程及各兵科操典教范，凡日本士官所用之科，无所不备，非特如此，且恐侨生远违父母，无人监责，致染不良习惯，故每星期必亲自临校讲授训育一科。斯时也，凡属侨生皆坐前列，以便询问侨情，且常怡情和悦，未有慢容，顾爱如斯，诚如父母之于子女，此在校中之情形也。

至于毕业优待尤诚，盖讲武学校章程，凡毕业学生皆须见习半年，始得充当军官，而我此次毕业之侨生竟得免见习，特设下列五条条件，随各侨生自认：一、各生自备斧资送外国游学；二、准各生自由前往它省办事；三、留滇见习；四、往个旧调查矿务；五、派往南洋各埠招侨商回滇倡办实业。由是吾侨生遂得个人意志自由行动。离滇之时亦代办护照，无微不至。此毕业后之情形也。

此文写于唐继尧组织讲武学校毕业生到南洋招商引资之际，当有过度褒扬之词夹杂。但，华侨学生受到云南各界官员、人民群众的关心帮助，使他们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却是个不争的事实。郑开文身为校长，管理讲武学校的事务肯定是分内的事，但是由于他为人低调，做事不善张扬，功成不就，把成绩与功劳推给别人。唐继尧当时是云南督军兼省长，当然许多工作成果都以他出面领受了。

云南省档案馆内存有郑开文写给云南高等法政学校校长李华先生的私人信函，语气委婉地请求对方特例接受三位华侨学生转入法政学校学习的事。从郑开文现存为数不多的信函中得知，平时谈论私事的信函极少，利用讲武学校校长的权势恳请别人帮忙，可能仅有这一份。写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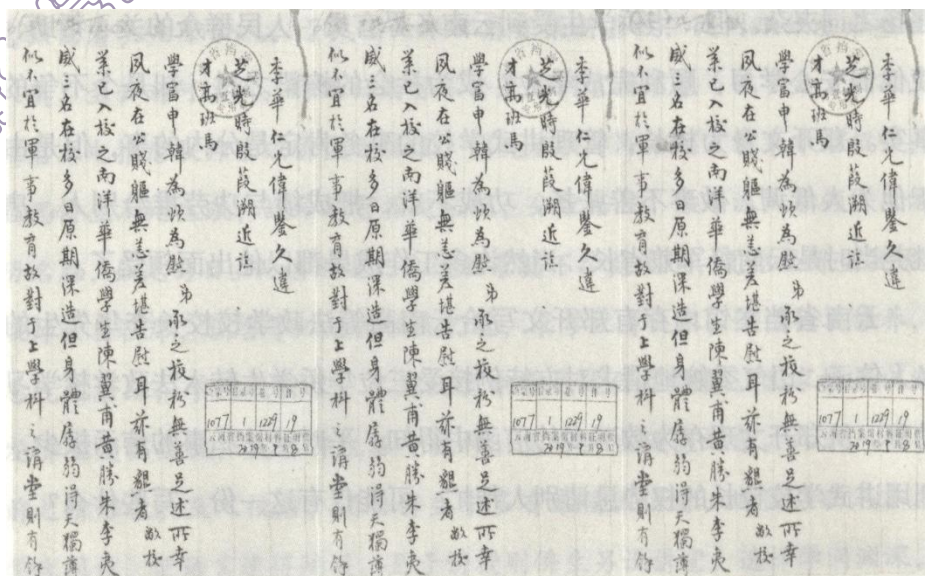
李华仁兄伟鉴：

久违芝光，时殷遐溯。近闻才高班马，学富申韩，为欣为慰。弟承乏校务，无善足述，所幸夙夜在公，贱躯无恙，差堪告慰耳。

兹有愚者，敝校业已入校之南洋华侨学生陈翼甫、黄胜朱、李夷威三名，在校多日，原期深造。但身体孱弱，得天独薄，似不宜于军事教育。故对于上学科之堂则有余；对于上术科之操练则不足，为天所恨，真无可如何也。然似此远道而来之人，设不筹法安置，使在外向隅，亦非吾辈与人为善之心。久仰阁下办事热心，精于法理，拟改校肄业使该生各尽其材而不至成为废人。感激之情实同身受。特此函达阁下，务望破除成例，从权收入，不胜企祷之至。至于贵校规矩如何？应上何班？学费、膳费以及寄宿地点，若有定章，请检掷数份，俾该生等早为预备为盼。此上。即颂崇安，诸希爱照不宣。

愚弟郑开文鞠躬

十月八日^[20]



郑开文关于拟将南洋华侨学生陈翼甫等三人送入云南法政学校深造的便函（云南省档案馆藏档）

从此信函所流露的情感来说，很像是替自己的儿女亲朋向有权势的人说项，恳其网开一面，法外办理诸如升学、求职、做官一类的私事。而此信函却是为远道而来、入地生疏的三位华侨学生因身体不适应严酷的军事训练而希望转学高等法政学校的请求。身为陆军中将、讲武学校校长竟能舍下面子，如此低声下气求助于他人，犹如为自家子弟求人办事、说情。意至深处，还不无技巧地详细列举“身体孱弱，得天独薄，似不宜于军事教育”，但是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故对于上学科之堂则有余；对于上术科之操练则不足，为天所恨，真无可如何也”。从大道义上让对方无法回却：“然似此远道而来之人，设不筹法安置，使在外向隅，亦非吾辈与人为善之心”。行笔至此，郑似乎是有点低声下气地顺势赞誉对方云：“久仰阁下办事热心，精于法理，拟改校肆业使该生各尽其材而不至成为废人。感激之情实同身受。特此函达阁下，务望破除成例，从权收入，不胜企祷之至。”为几个华侨学生的转学事情，按正常程序，本可以公文行转，副官、秘书办理，可能时间旷久，结果难料。而郑开文出于责任、亲情而求于他人，行文如此的谦恭且颇费心机，平生仅见一次，此情此景，让人动容。

信函很快有了回应：

炳然先生大鉴：

捧读华章，备聆雅教。拟将南洋华侨体弱学生送入敝校收学，仰见因材施教，自当敢不唯命是遵。惟现在敝校仅有附设高等预备科甲部一班，堪以编入。兹将章程抄录一份，送请查照。至章程第七条“学生不得入本校寄宿舍”一层，亦可通融办理，其地点系在校内东南隅，合并奉闻。专此函覆。敬颂勋安。附章程一份。

愚弟饶某某鞠躬

华侨学生转学马上有了安排，效果出奇的好，连最难解决的学生住宿问题“至章程第七条学生不得入本校寄宿舍一层，亦可通融办理。其地点系在校内东南隅”。要知道，云南高等法政学校校长李华先生是云南“重九起义”的功勋人物，云南军督府成立时的学政司司长，在郑开文校长的请求下，能如此快速办好华侨学生转学一事，足见其对郑开文的重视。亦可见，不管是郑开文

的委婉请求还是高等法政学校校长亲自将三位华侨学生妥善安排好转学事项，还特别破例安排华侨学生在校内住宿，都表明云南各界对华侨学生关怀备至，使这些远道而来的学生，快速融入云南社会，学有所成。不能不说，这是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毕业后，都能以服从的精神自觉自愿地去承担社会责任，做应该做的事，其出发点显然不是为了获得奖赏或升官发财，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忠实地履行报效国家的责任。

从讲武学校毕业的学生，部分人职云南军队，成为滇军的骨干力量。部分学生积极参与云南的经济、社会活动，如第十二期梁英等 65 名毕业生参加云南矿产调查、劝招南洋商人回滇开办实业；组织《留滇华侨学生俱乐部》，积极实施与南洋各埠侨商的联系、联络，组织南洋华侨捐资募款，襄助粤军军械、饷糈。除梁英等 65 名第十二期学生署名“华侨学生致南洋华侨胞书”一文外，还有华侨学生杨永仁署名《讲武堂华侨学生上南洋侨胞书》、“留滇华侨学生俱乐部发起词”、“云南侨商招待处缘起”、“云南侨商招待处简章”等通告、电文刊登于当时报纸上，成为那时的舆论热点。

在护法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刻，武校华侨学生在政治上呼喊华侨各界，坚持民主共和的国家理念，反对桂系军阀对广东的统治，提倡粤人治粤，声援孙中山领导的粤军驱除桂系军阀的正义战争。关于留滇华侨学生活动的遗迹，有“留滇华侨学生俱乐部”关于粤桂战争的通电数件，如：

贺粤军各同胞将士电：“……捷报遥传，亿兆腾欢，尤望追奔逐北，歼彼廉来，使苗蛮匹马不回，为我岭南增色，毋令三湘将士独擅其美，则同人等晨夕无任馨香祷拜之至也。特此道贺。”

致李部长协和电：“……吾粤自被口口征服，不见天日者于兹数载矣，今皇天悔祸，贼党命数将终。所以潮汕之役，一鼓破虏，斩杀无数。现方苦战惠、阳，遥望视民如伤遽，兴牧野之师，则吾粤民有生之日皆出自高厚之所赐也。”

致上海华侨学生联合会电：“……吾粤自被口口征服，不见天日者于兹数载，今老天悔祸，贼党罪恶贯盈，行将就戮。所以潮梅之役，一鼓破虏，斩杀无数，现方苦战惠、阳，遥望一致主张讨伐，作我民气，使苗蛮残贼无地潜行，则同人等生斯长斯亦聊可告无罪于万一耳。”

致香港报界公会电：“……广东者乃吾广东人之广东，自被口口征服，不见天日者于兹数载，今老天悔祸，贼党罪恶贯盈，就戮之期行将不远。所以潮梅之役，一鼓破虏，斩杀无数，捷报遥，亿兆腾欣，现方追奔逐北，攻击惠、阳，遥望一致主张讨伐，作我民气，使廉来盗跖无地潜形，则同人等生斯长斯亦聊可告无罪于万一耳。”

华侨学生贺陈总司令光复广州电：“……现接广州来电，方广州光复，总司令于九日进城。敝部同人风声遽听，距跃三百。夫自桂匪陆、莫盘据我粤，苛政百出，荼毒生灵。据岭南为萑苻之场，置黔黎于水火之内。我公不忍坐视，逐誓六师，以歼群丑，口枪扫而莫逆亡，义旗指而粤民安堵。反（返）我河山，复见汉仪。从此珠海无波，羊石焕彩，慰三千万零霓之望；奠亿万年民治之基，引领粉榆汴欢曷极。谨抒寸款，遥为顶贺。”

如此频密的电文、通告、文章宣传，形成了留滇华侨学生关切国家大政方略、声援孙中山领导的“粤人治粤”运动、助力革命战争的强大舆论冲击波，体现了留滇华侨学生团体秉承“五四运动”学生参政、议政的传统，遂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特殊群体。

社会各界对留滇华侨学生的举动大为赞赏，分别致文予以支持鼓励。时任广州军政府参谋部长李烈钧致辞曰：“……新安体用相胥，阳明知行合一，绩学致用垂范千古。诸生不患无时而患无志；不患无识而患无器；不患无才而患无学。求学以宏器，典学以应事则济矣。诸生侨居海外，以会泽宏开教育得负笈于金马碧鸡间，前途诂可限量。诸生多粤人亦忆粤中物产饶富，人材众多，有为于国。今则何如昔勾践之复越也，卧薪尝胆，以达其志。诸生其毋忘桑梓，勤勉学业，共策振兴。”

另外，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还吸引了中国周边邻国的青年学子踊跃到昆明报考讲武学校。为了保密，他们都有着中文名字和中国城市的籍贯地，却不会说流利的汉语。如东北籍学生李国根，真名李范奭，有些资料说他是孙中山直接介绍过来的，真实身份连郑开文校长也不清楚。其实不然，李国根等人是韩国流亡政府介绍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学习军事的，郑开文在日本期间就与韩国的留日士官生比较熟悉，对大韩民族受到的亡国之痛，引为前车之鉴，并支持他们的复国运动。1909年春，郑开文、唐继尧结伴回国参加清政府“留洋学生试验”时途经韩国，曾留有诗词，对朝鲜民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殖民的现状深表同情。诗曰：

旅次朝鲜釜山

作者：鲁戈（郑开文此时用的笔名）

一山孑立万山寒，满目愁云不忍看。
海上危樯悲落日，腔头热血兢狂澜。
国权已失君犹乐，兵力难伸种已残。
早识依人成枉事，旗翻独立健登坛。
文明保护虚前事，亡国千秋付浩叹。
蹈海客伤奴隶苦，移山人作马牛看。（日人开拓釜山遣用韩人）
荒城鬼哭西风紧，枯树猿啼夜月寒。
回首乡关云雾里，扁舟一系声漫漫。^[21]

李国根这些韩国学生，是带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和强烈民族感情来学习军事知识的，非常努力，非常刻苦。李国根初来时，中国话说、听都不是很流利，对云南、广西、湖南这些有家乡口音的教官上课，经常听不懂。郑开文就组织他们课外补习汉语，布置他们班的同学，一个帮带一个，帮助他们很快渡过汉语学习这一关，跟上了学习进度。

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学生、号称“铁骥将军”的大韩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奭将军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学习情况：“我们从入学到毕业共有两位校长，一位是李根源，他是中国革命军中有名的人物。还有一位是郑开文，是唐继尧最好的部下。唐继尧将军给郑校长的指示是：他们五个将是中国政府重用的人，又是将来要到海外工作服务的人，所以校长要重点培养，一定要像对华侨学生一样培养。……有一天校长亲自来找我们五人，一般情况下校长不会亲自来找人的，我们都很怕，低着头站在他面前，可是他非常亲切，温和地对我们讲：‘你们都是东北人，到这里气候和很多的生活习惯都不适应。特别是吃的，很不习惯吧？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是军人，要以军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将来才会成为优秀的军人，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校长没把我们当成外国人。”^[22]其表述也能表明郑开文校长对华侨学生、韩国留学生的培养和关心照顾可真是大不一样。

自利等，这时崔震大声喊“不是”，教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赶紧拉崔震的手，他甩开，当时我吓得脸苍白，教官还以为我病了，让我快到军医处看一看，我出来后坐在楼梯上大哭，就这样分散了教官的注意力，没有深究下去。

刘教官有个弟弟叫刘耀扬，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步兵教官，他是战术能力最强的年轻教官，我们对他很感兴趣，他也非常关照我们。我们从入学到毕业共有两位校长，一位是李根源，他是中国革命军中有名的人物。还有一位是郑开文，是唐继尧最好的部下。唐继尧将军给郑校长的指示是：他们5个将是中国政府重用的人，又是将来要到海外工作服务的人，所以校长要重点培养，一定要像华侨学生一样培养。

有一天校长亲自来找我们5人，一般情况下校长不会亲自来找人的，我们都很怕，低着头站在他面前，可是他非常亲切，温和地对我们讲：你们都是东北人，到这里气候和很多的生活习惯都不适应，特别是吃的，很不习惯吧？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是军人，要以军人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将来才会成为优秀的军人，你们一定会成功的。

大韩民国李范奭著《铁驥 李范奭自述》（局部）（中译本）

郑开文校长对武校学生特别的厚爱，别看他在校时生性严谨，不苟言笑，但在平时与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对出类拔萃的学生尤其器重。华侨学生叶剑英等人热情豁达，交游甚广，气度宏伟。特别是叶剑英发表在武校学生自办刊物《诗剑》上的《夜宴》诗词，记述当年同学聚会的情景。但是，诗中所表达的豪迈气度和宏大格局令人震惊，让郑开文极为欣赏，当时就认为该生必成栋梁之材。我们一起来看看叶剑英元帅在学生时期的佳作：

七律 夜宴

月满危楼花满园，花前月下宴王孙。
频移杯影浑忘醉，几次琼香对笑论。
兴爽春衣沾露湿，情高秋思落诗魂。
更怜良夜嫌更促，把剑长歌气压弗。

那时，昆明威远街大柳树巷三十八号建有一栋商住两用的两层楼房，是郑开文的住宅，学生们戏称为“郑公馆”。郑家子弟如五弟郑开宇担任讲武学校副官和区队长，族亲林丽山担任讲武学校第十二期区队长，二女婿朱纵文、侄子郑汝定当时都在武校学习。同学、区队长、校长之家谁也不想弄清楚有什么区别，学生们常常把这里作为聚会、聊天的好地方，节假日、闲暇时间更是热闹非凡。郑校长很喜欢这些学员的到访，谈古说今，纵论兵事，交流诗词格律亦无不可，高谈阔论，无所忌讳。其驰骋疆场的传奇阅历和带兵打仗的丰富经验，则是年青学子们难得的课外“佳酿”。

郑开文校长也希望他们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融合，能使郑家子弟能够改变些习性。譬如，朱纵文同学虽是郑开文的女婿，本人也很努力，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云南六十军历次残酷的战斗，

从死人堆里爬出，劫后余生。四十年后，当叶剑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时，曾经同座的朱纵文同学亦光荣擢升为上尉连长。可见，人的一生所能取得的成就，从一开始就因为每个人的禀赋不同，即表现为思维方式、亲和力的不同而分野。有的人，当徒弟时就表现出大师级的见地，坚忍刻苦的历练不过是尽善尽美而已。有的人，当了一辈子师傅，其水准还是工匠等之。若此说，郑开文校长对于认识人，培养人的气度、格局的见解就是不同于常人。

据外婆回忆，那时武校学生经常去郑公馆，则还与武校清汤寡水的伙食有关。郑开文为培养未来军官们的素养，可谓是剑指偏锋，无所不用其极，连忍饥挨饿也算是生存训练的必备课程。这可把年轻力壮、正在发育长身体的年轻学生们害惨了，直呼“惨无人道”。饥肠辘辘的军校生涯，郑开文在日本士官学校可没有少挨，深有同感。所以，每有学生到家，郑开文都要嘱咐家里为他的得意弟子们改善一下生活，打个牙祭。外婆是广州人，整治的饮食，自然适合下江人（泛指长江南岸广大地区的南方人）、华侨学生的胃口。所谓交流学习，互相影响的功效未知，蹭顿饭吃，填补些油水，谁说不宜。

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朱德元帅、叶剑英元帅，以及众多爱国将领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时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和人格魅力以及极大的亲和力。不能不说，伟大人物在云南开启他们的人生大幕，并非偶然，这是云南人民深以为傲的。

第七节 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响彻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

郑开文亲自草拟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章程，亲自给学生讲课，着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提倡忧国忧民、精忠报国、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武德，以自己亲身经历倡导浩气凛然地捍卫国家疆域完整和满腔热血地保护人民群众安危的军人修养；着力培养陆军讲武堂师生鲜明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情怀。这种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的军事教育，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最后通过军人们的长期不懈努力和战场的生死考验，升华为一种敢于建功立业的创造欲望，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献身精神。

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最可歌可泣的壮举发生在抗日战场上。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侵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紧急关口，一度各为其主的讲武堂师生再次携手，共赴国难，并肩作战，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慷慨激昂的军魂之歌。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朱德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二期毕业生叶剑英将军，前任八路军参谋长，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七期毕业生周保中将军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第二路军总指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生周建屏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着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在华北、华中的广大地域内与日寇浴血厮杀，取得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一系列重大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2年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周保中任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周保中及其麾下的东北抗日联军，露宿于冰天雪地之中，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南下的企图。1945年8月率部配合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和接应八路军、新

四军调赴东北的部队，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民国政府抗战部队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担任国军军、师长以上的将领有 70 多人，旅团长数百人。他们领导和指挥的作战部队在祖国广袤大地上，与日寇英勇作战，建立了丰功伟绩，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最慷慨豪迈的御寇壮歌，当属滇军。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时任云南省主席龙云，先后组建了第六十军、第五十八军、新三军等三个军奔赴抗战前线，加上由原驻粤滇军改编的第三军，一共四个军。这四个军主要由云南子弟组成，各军军长及各级指挥官主要是讲武堂的毕业生，先后参加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大会战等战役 20 余次，与日军浴血奋战，英勇悲壮，伤亡 10 万余人，被誉为“国之劲旅”。

著名的抗战名将有：云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生、时任第三军军长曾万钟、唐淮源。讲武堂第四期毕业生、抗战胜利时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讲武堂第十三期毕业生、时任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生，时任第 12 师师长寸性奇。此外，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还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抗战部队中，其中有不少人担任高级将领。如中印缅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萧毅肃（十四期）、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又新（十六期），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代理参谋长胡若愚（六期）、第三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文朝籍（十二期）、第十九路军参谋长赵一肩（十三期），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十六期）、第五军军长李振球（十二期）、第三十七军军长黄国梁（十二期）、第五十军军长田钟毅（四期）、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十五期）、第七十九军军长王甲本（十四期）、第八十三军军长莫希德（十三期）、第八十六军军长朱鼎卿（十八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十八期），以及远征军五十四军副军长叶佩高（十八期）、第五十七军副军长周开勋（十三期）等。第十七期毕业生朝鲜人崔庸健时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代理军长、第二路军总参谋长，率部在东北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第十二期毕业生韩国人李范奭时任韩国光复军参谋长兼第 2 支队支队长，在中国大地上协同周保中抗日联军对日作战，铸就了光复大韩民国的辉煌业绩。

突然想起读小学时的一件往事，同学的父亲魏瑛先生是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生，曾是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军队在海城起义的著名将领，时任云南省农展馆馆长，居住在翠湖边的讲武堂内，家里宽敞，是我们学习小组做功课、排练节目的好去处。那时的魏瑛先生高大英武，走路说话无不透露出军人的气魄，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是我们非常崇拜的“大人”。有时会纠缠他给我们讲故事，他讲述在抗日战场上由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第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场、在武汉保卫战中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故事，让我至今不忘。我想试着把他当年的讲话记录下来，又恐怕时代久远，遗漏疏失难免，为避免失去依据的“口述历史”，还是引入魏先生在九十年代撰写的回忆文章，比较妥当。魏瑛著《从台儿庄战斗到海城起义》中叙述：

1938 年春末夏初，第六十军开到山东境内运河西岸，张冲师长带着我营先过运河，看到台儿庄这个大城镇被日寇抢劫一空，官兵们无不义愤填膺。……次日下午，大部分部队在湖庄、禹王山一带与日寇遭遇，战斗非常激烈。在运河东岸我们与日本侵略者血战五十昼夜，自旅团长以下整营整连的官兵伤亡，部队大量减员，我军奉命撤退时，我营执行掩护任务。我们在运河东岸坚守，并向前方派出大部队牵制着敌人，两天一夜敌人都不敢前进一步。完成任务后，我们才撤退到运河西岸。由于伤亡大，这时决定将我军由三个师缩编为一个师——一八四师，仍由张冲任

师长。^[23]

魏将军是个谨慎之人，也许受限于文章的篇幅要求，没有展开细节部分，但这却是我愿意花费大力气去追寻这段铁血历史的最初启蒙。调查表明：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枣（庄）支线及台潍（坊）公路的交会点上，扼运河南北漕运的咽喉，是徐州的北大门，在军事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旦台儿庄落入敌手，便可与津浦路南段日军南北对进，一举夺取徐州。1938年1月12日七、八万日军分两路向台儿庄进犯。一路为板垣第5师团，在青岛灵山湾、福岛两处强行登陆后，沿胶济路西进，至高密转南，经诸城、莒县一线，前锋直逼临沂。另一路为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该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直扑台儿庄。两个师团齐头并进，企图在台儿庄会师，再合攻徐州。

2月，中国军队为阻击日寇前行，在临沂、滕县同日寇爆发了惨烈的战斗，台儿庄会战的序幕就此揭开。在李宗仁的统筹指挥下，临沂之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齐头并进、会师台儿庄的计划，这样，向台儿庄进犯的矶谷师团就成了孤军。在武士道精神的刺激下，矶谷廉介不顾自己左翼空虚，仍一味向南猛攻，攻陷滕县后，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李宗仁判断矶谷攻陷滕县，正骄横狂妄，必定不待津浦路南段日军北进，便会直取台儿庄，以期一蹴而下徐州，夺取打通津浦路的头功。于是，他密令汤恩伯所部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矶谷廉介直扑台儿庄后，再回头与孙连仲一起将敌包围而一举歼灭。战事的发展也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矶谷师团从滕县南下，直插台儿庄。3月23日，4万敌军在七八十辆坦克、百余门山炮和重炮的支援下，向台儿庄发起猛烈进攻，台儿庄会战的战幕正式拉开。五十昼夜的拉锯战，云南第六十军面对的是日寇的精锐部队：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共4万多人的机械化部队，装备有飞机、大炮、坦克、火焰枪、毒气弹等武器。而我第六十军初到鲁南平原，战场环境与以往山地作战大不一样，由于时间短促，部队仅能设置简单的防御工事，战斗中几乎是军人们用血肉之躯阻挡了日寇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坦克、装甲车的反复冲击，血流成河，尸体堆垒，致使第六十军三个师战后仅能缩编为一个师，滇军以伤亡20000余人的代价，阻止了日本侵略者南下徐州的计划，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这一切都被档案材料证明是真实发生的：

卢汉4月26日电

急。昆明。司令长官龙钧鉴：勋密。有戌、亥两电均奉悉。此间地形平坦，仅以村落为据点，敌人炮火甚烈，故牺牲最大，多数均在原阵地，人枪埋没不能取出，只轻伤者能运后方。自养（廿二）迄本晚止，除张师每团伤亡数百尚存四分之三外，高师仅存千余，安师仅存六七百，官长约伤亡三分之二。刻仍奉命固守台庄正面，原有及新增友军共约四十余师。谨呈。职卢汉叩。宥酉机。印。^[24]

电文中“张师”为云南第六十军184师师长张冲或张冲师长部。“高师”为第六十军183师师长高荫槐或高荫槐师长部。“安师”是第六十军182师师长安恩溥或安恩溥师长部。第六十军在台儿庄英勇作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据统计，全军参战官兵共计36161人，阵亡14229人，受伤4543人、失踪430人，合计19202人，占参战人员的53.01%。其中182师战前官兵共有12699人，战

战斗中伤亡失踪 8061 人，战损比例达 640/0。183 师战前官兵共有 11587 人，战斗中伤亡失踪 6271 人，战损比例达 54%。184 师战前官兵共有 11875 人，战斗中伤亡失踪 4870 人，战损比例达 41%。

两军对垒，弱势一方知难而退，这是战争的潜规则，聪明的前线将士谁都晓得生命只有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奇诺防线被德军攻克后，识时务的将军、政客们都很快学会了“德语”。然而，在中国、在鲁南平原的台儿庄，这么惨重的伤亡也没有让中国军人屈服，后退。1941 年 5 月，云南讲武堂第十三期毕业生、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浴血奋战 13 天。在山西夏县东交口，因弹尽援绝，拔枪自戕。唐淮源兵败中条山饮弹殉职前，乃以气壮山河之笔写下遗书：望后人收拾残局，继续抗战，才能瞑目！1941 年 5 月，云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生，时任第 12 师师长的寸性奇在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时，因多次负伤，无法自救，举刀自戕，血染中条山。1944 年 9 月，云南讲武堂第十四期毕业学生，时任第 79 军军长王甲本在湘桂战役中，率部在湖南东安县与敌激战九日，肉搏时被敌人刺中腹部，壮烈殉国。据记载，王甲本牺牲后端坐义气亭，怒视前方，离他不远处，有他的副官、卫士、参谋，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高荫槐将军是我熟知的，在 1912 年的援藏平叛的战役中，郑开文就非常看好他。西征滇军撤离滇藏边界时，需要在德钦地区安排一名弹压委员来主持后续工作，郑开文推荐由二等参谋高荫槐担任重担：“查有钧部高参谋荫槐，性质刚勇，学识俱佳，若以之为弹压委员，平时可望其整顿边事；战时可望其协同动作，是一举二得者也。”郑先生果然有眼光，二十多年的历练，高荫槐先生早已功成名就。在国家危亡时刻，高将军毅然率部出滇，奔赴抗日战场第一线，在极端困难时，坚持战斗，浴血搏杀，他率领的第六十军第 183 师，战后仅剩 5000 余人，但阵地丝毫未动，为友邻部队的突围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4 月 22 日拂晓，我军 183 师 542 旅 1081 团尹国华营与日寇矶谷廉介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在陈瓦村遭遇并展开激战。在我军缺乏炮兵掩护的劣势环境中，与日寇主力殊死搏斗，从早晨持续到下午。在日军坦克、飞机的持续进攻下，伤亡惨重，营长尹国华阵亡。傍晚时分，全营仅剩二十多人，在夜幕下选择突围，遭到日军追击，全营最后仅剩一人生还，其余官兵皆壮烈殉国。

4 月 23 日，云南讲武堂第七期毕业生，时任第六十军 183 师 542 旅旅长的陈钟书率部坚守邢家楼、五圣堂一带，在面对拥有坦克支援的日寇作战中，苦战一昼夜不退，此时粮、弹告罄，陈钟书不得已命令部队上刺刀，与日寇展开殊死白刃战。在白刃战过程中，被日军骑兵射过来的子弹击中头部，隔日在送往徐州野战医院的途中伤重不治，与世长辞。陈钟书旅长在滇军中素有勇将之名，此次出征，常语同事：“数十年来，日本人欺我太甚，这次外出抗日，已对家中作过安排，誓以必死，决心报答国家。”

云南讲武堂第十一期毕业生，时任第六十军 183 师 1083 团团长的莫肇衡指挥全团剩余官兵与日寇激战一昼夜，次日凌晨，在跟日寇拼杀中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警卫人员将莫团长背离火线，他扯下一片衣襟，饱蘸胸前涌出的鲜血，在火石埠小山下的一处岩壁上，用尽最后的气力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而亡。

25 日晨，疾风骤雨般的炮弹倾泻过后，台儿庄外围阵地工事基本被摧毁，日寇板垣师团、矶谷师团各派一部继续猛攻蒲汪，第 182 师 1079 团官兵又伤亡 400 余名，全团伤亡人数已达 1/3，代团长钟光汉右臂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25 日午后 14 时起，日寇动用各种大炮一百余门，

出动轰炸机十余架轰击蒲汪，并向该地投掷了大量的燃烧弹和毒气弹。一时之间，蒲汪一带炮火连天，浓密的黑烟中烈火熊熊，高达数丈，血肉横飞，声震数十里。蒲汪村不仅房屋烧光，全村土地已如用犁头犁过一样，全部翻了过来。到15时半，炮火方停，敌步兵和战车在蒲汪阵地的东北面和西面三面围攻，数度冲入蒲汪。17时半，第一营营长王承祓率部百余人从南绕到西面，出敌不意，向敌侧后袭击，方将日寇击退。战斗十分激烈，王承祓所率百余人仅生还十余人。击退日寇后，五四零旅旅长郭建臣、一零七九团代团长钟光汉先后在电话中向安恩溥师长报告：“昨日以来所剩官兵，在今天的战斗中伤亡过半，阵亡官兵多数是死在日寇炸弹、炮弹之下。现在战斗虽暂缓和，但耿庄、小村、凤凰桥等地区尘土飞扬，日寇战车和步骑兵异常活跃，敌机数架在上空不断盘旋，必复来猛攻。现存官兵虽仍然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但情况十分危急。特别是缺乏战炮，只有加速设埋地雷并辅以集束手榴弹和用13.2毫米机枪的办法来将就对付敌人的战车”。……当郭建臣到蒲汪东北突出部代营长范文学的阵地上时，问他们还有几个人，范文学回答仅剩18个人了。并说“请旅长放心，我们经过十几年的训练，知道军人最大的光荣就是献身祖国。到了今天，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决不许敌人越过此地一步！”。正在这时，日寇又向蒲汪发起猛攻，20余辆战车在村内横冲直闯，蒲汪的掩体多被摧毁，吕建国排十余人防守的西北角阵地被日寇用重型坦克碾成了平地，吕建国等十余人全部壮烈牺牲。26日傍晚，第六十军183师1082团团长严家训在战壕中被日军炮弹片击中，献出宝贵生命。连长黄人钦在战斗中阵亡，在其身上发现一封致新婚妻子的遗书，其中写道：匪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幸勿自误。

……

从敌方的文档资料中，我们也能从侧面了解到台儿庄战役的状况：整个阵地血流成河，死伤无数，中国军队毫无畏惧，视死如归，英勇战斗的精神，给予敌人惊心动魄的震撼。原日本第101师团濑谷支队第十联队小队长赤柴八重藏在《步兵第十联队史》一书中记载：日军对我军的“战斗精神”“生死决战的勇气”非常敬佩，“中国军队仅凭借散兵壕沟，全军都要进行最后的抵抗，不退半步，最终所有敌人（中国军队）全部死在了狭窄的战壕之中，重叠相枕，极其壮烈，让人感叹！”。书中透露，日军曾通过翻译进行劝降的活动，然而前方守军誓死不投降，宁愿牺牲，也不后退半步。另外，有一个细节描写，那就是中国士兵的茶杯上都刻印有“卧薪尝胆”四个字，日军分析，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军队坚决抗战的意志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样的记载与我军“忠勇的中国将士，面对呼啸的炮弹和密集的子弹，毫无畏惧，铁一般的意志守护着阵地，即使粉身碎骨，也没有一人后退半步，离开阵地”的记载吻合。

日军自1931年“九一八”与中国军队开战以来，从未遇到过像滇军这样顽强的劲旅，只好将主力向微山湖西移。台儿庄会战在李宗仁的指挥下，歼灭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两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

当胜利到来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代表四亿中国人民，代表在十四年抗战中三千五百余万伤亡的中国民众，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投降。1945年8月，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4期学员萧毅肃，时任陆军总参谋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湖南省芷江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仪式。1945年9月

9日，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受降总指挥萧毅肃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命令第一号》交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冈村宁茨在受领证书上签字用印。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官，时任中国陆军部部长的何应钦，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盖章。1945年9月14日，云南讲武堂第十三期毕业生，时任第58军军长的鲁道源，在江西南昌受降，日本冈村宁茨在投降书上签字用印。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毕业生尹继勋，曾参加中条山战役，历任团长、旅长。1945年9月，时任第一集团军司令部少将副参谋长兼越南前进指挥所主任，在河内办理对越北日军受降事宜。云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生卢汉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卢汉任第六十军军长，率部参加台儿庄等著名战役，升任军团长，集团军副司令、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日军投降后，率部赴越南受降，1945年9月28日，卢汉在河内正式接受日军土桥勇逸的投降。

一个国家的军队如果没有战斗力，这个国家就剩下屈服与灭亡。中国人民浴血抗战长达十四年之久，以伤亡三千五百多万军民的代价，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改变了1840年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瓜分的颓势，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国势走向，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屈辱历史。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迅速崛起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正是孙中山等无数先烈们苦苦求索，浴血奋战的目的。

在这场圣战中，充分体现了根植于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浸染熏陶下的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在危难时刻所激发出来的战胜一切敌人的坚强意志。中国军人不屈不挠，共赴国难，甘愿献出自己生命的军人精神，充分体现了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军人心中，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挽救了中华民族再次被颠覆灭亡的危亡困局。包括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和滇军在内的中国军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为保卫国家而甘愿献出宝贵生命的军人精神，让人钦佩，让人动容，让人热血沸腾。

远去了鼓角争鸣，暗淡了刀光剑影，历史的硝烟也慢慢散去。但是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曾产生过莫大影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以及从这里走出来的那些军人们，他们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建立的功勋，被载入史册永垂不朽。

- [1] 郑开文撰《郑开文销差信》，转载自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12-80226-14。
- [2] 云南《义声报》，1916年12月6日第3版。（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 [3]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郑开文致唐继尧电文》，1919年8月24日，档案号：1106-003-00144-027。
- [4] 《云南陆军讲武堂华侨学生为护法运动向华侨募捐饷需信》，转载自《护法运动》“云南省长公署档案”，第365-368页。
- [5] 胡博撰《再谈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校史》，转载自云南陆军讲武堂研究会编纂《云南陆军讲武堂建校110周年研讨会文集》第32页。（内部资料，2019年9月）
- [6] 韩国李范奭著《李范奭将军回忆录》，昆明社会科学院编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1月。
- [7]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暂行内务细则》稿本。（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影印件）
- [8] 郑开文（忧患余子）著《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1906年《云南》杂志第一号。
- [9] 唐继尧《都督高等巡警学生毕业训词》，原载《滇声报》1916年3月9日。
- [10][11] 郑开文（忧患余子）著《论滇省宜仿照南北洋举办征兵》，1906年《云南》杂志第一号。
- [12] 云南省档案馆藏档《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第十三期留昆同学编写了讲武学校第十三期师生名册》，档案号：56-2-362。
- [13] 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陆军军官学校教育方针》，转载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68页。
- [14] 转载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展品《日记》。（云南陆军讲武堂博物馆提供）
- [15] 转载自《义声报》1920年9月24日《郑司令整顿警卫军之训词》。（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 [16] 蔡正发点校注释，云南陆军将校讲习会讲演稿汇编《明体达用》注释，云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7月，第296页。
- [17] 本文载云南《义声报》1916年12月19日，第9页。此文获云南省学术批评处第二次试验甲等第一名。（云南省图书馆藏史料，缩微胶片）
- [18] 曾其清、曾其伟遗稿《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华侨学生概况》，《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79年6月，第140-147页。
- [19] 唐继尧着、王世昭校点《会泽笔记》（台湾初版），转载自会泽民间唐继尧研究会编《唐继尧研究》第二辑，第162、154页。
- [20]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郑开文关于拟将南洋华侨学生陈翼甫等三人送入云南法政学校深造的便函》，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档案号：1012-008-00226-014。
- [21] 原载《云南》杂志，第十九期，1909年8月出版。（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云南》杂志缩微胶片）
- [22] 韩国李范奭著《铁骥 李范奭自述》，转载自中文译本，昆明市社会科学院编，龙东林、朴八先编译《李范奭将军回忆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3页。
- [23] 魏瑛著：《从台儿庄战斗到海城起义》，转载于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海城起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36页。（魏瑛之女魏汝林提供）
- [24] 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内部期刊），1995年9月，第91页。